

的中國運動主義共產
幼稚派左

著 寧 列

版 出 社 放 解

列
寧 著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個用通俗語言來說明馬克思主義戰略的嘗試

一九四七年七月印行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

寧

著

解放社出版

東北書店發行

中文編譯部的話

列寧著的這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於一九三六年新出版的俄文單行本譯成中文的。書中除作者的原註外，凡標明『編輯部註』的註解，都是該學院編輯部所下的註解。至於譯者爲便利讀者起見所加上的註解，都標明『譯者註』三字。書後的附註，是由上述學院所編的俄文附註譯成中文的。俄文本附錄中的人名錄，並未列入中文本。

中文編譯部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目 錄

中文編譯部的話

- 一 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俄國革命有國際意義呢？……………二
- 二 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六
- 三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一〇
- 四 布爾塞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鬭爭而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一六
- 五 德國共產黨底「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係……………二五
-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三四
-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四六
-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五九

九 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七三

一〇 結論……………八九

增 補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一〇八

二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一一一

三 意大利的徒拉梯及其同道……………一一四

四 由正確的前提做出錯誤的結論……………一一六

瓦英庫普底信……………一二三

附 註……………一二五

我把這篇論文※獻給魯易·喬治先生，以表示我感謝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所作的演說，因為這篇演說差不多是馬克思主義的，無論如何這篇演說對於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和布爾塞維克是非常有益處的。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作者

※ 列寧在「這篇論文」四字上面，寫了「這本小冊子」五字。獻給魯易·喬治的這一段話以及副面上書名後邊的一個附註，都沒有刊入俄文第一版。

編輯部註

一 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

俄國革命有國際意義呢？

就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俄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的最初幾個月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很豐富的國際經驗，可以十分切實地證明，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並非只有一個國家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意義，而是有國際的意義。我這裏所講的國際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如果就俄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起來，那末，俄國革命，非只有些基本點具有國際意義，而是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是的，我是就最狹義而言，即是說，我們要用下面一種見解去了解國際意義：就是俄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方面也有重大的意義，換言之，在國際範圍內，這種現象必然要在歷史過程中重演出來，因此不得不承認，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是有這一種國際意義的。

如果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俄國革命基本點中之有些基本點，那自然是極大的錯誤。同時，將來無產階級革命，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

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不成爲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就「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講起來）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是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情形却正是如下：俄國的模範，使各國看見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要發生的事件當中的某些事件，而且是很切要的事件。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這一點——而且與其說懂得這一點，不如說由於他們革命階級的本能而覺察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理論和策略原理便具有國際「意義」（狹義的說）。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德列爾之流，却完全不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uchverlag-Haft: 11; Iensz Brand ※) 這本無名氏的小冊子（註一），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底整個思想過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一點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之不澈底、拘泥小節、卑污齷齪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理想的招牌來粉飾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以後有機會再來詳細討論。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

※ 社會書局伊格納察，布郎達印行，叢書第十一種。

編輯部註

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先看到了將來可以有下述一種局面，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精神將成爲西歐的模範。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斯拉夫人與革命』。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不僅可以認爲斯拉夫人已經加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可

以認爲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已逐漸移到了斯拉夫人那邊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之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就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移向俄國……。俄國會由西方吸取了這樣多的革命創作力，它現在或許自己要成爲西方革命精力底根源。如火如荼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品，將一切已開始滋蔓於我們中間的腐敗的市俗習氣與近視的政客行爲，一掃而清之，使鬥爭底熱忱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所表現的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與專制勢力底簡單支柱了。現在情形也許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與專制勢力底支柱……。如果俄國革命家不須同時與俄皇底同盟者——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俄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一次能夠把兩個敵人都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老祖宗更崩壞得快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烈士們（可惜在鬥爭中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痛苦和鮮血，總不會落空的。

他們的痛苦和鮮血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嫩芽，使之發育得更迅速、更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春風，溶解反動底冰雪，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見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第十八期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的報紙——『火星報』）

十八年前的考茨基寫得多麼好呵！

二 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的鐵的紀律，如果它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群眾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它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底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它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系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勢力與小生產底勢力。因為小生產留存在世的，可惜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的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這個問題人們時常講到。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致歡迎辭外，難道不應當時常去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夠養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塞維主義之成爲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塞維主義整個存在時期底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塞維主義何以能夠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靠什麼東西來檢驗的。是靠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它的堅忍性、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靠它善於同廣大勞動群眾——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群眾，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聯系，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它的政治的策略與戰略底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群眾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這種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真正能夠充當先進階級（以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內部之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整飭紀

律底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艱苦經驗，才能造成；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種條件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本身也不是信條，這種理論只有與真正群眾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系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布爾塞維主義之所以能夠養成最嚴格的、集中的與鐵的紀律，並且能夠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是在於俄國歷史上的許多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主義於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但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的迷惑、遊移、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大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處在空前野蠻與反動的俄皇專制壓迫之下，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如渴思飲，它用了驚人的奮勉精神與縝密態度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世紀裏，受到了空前的痛苦與犧牲，表現了空前的革命勇氣，它表現難以設想的努力，它專心致志從事探究，它在全世紀裏經過訓練、實驗、失望、審查、參照歐洲經驗等等折磨，它真正受盡了千辛萬苦之後，才獲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與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其國際聯絡之頻繁，及其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之熟悉，爲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固的理論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底豐富，世界上沒有倫比。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革命經驗，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祕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群眾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交替，都沒有這樣迅速和複雜。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積聚這樣多的現社會一切階級鬥爭底形式、方法以及鬥爭所帶的色彩；而且因為俄國底落後與俄皇政府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特別快地成熟起來了，特別迫切和順利地領會和採用了相當的歐美政治經驗底「新發明」。

三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底準備時期（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到處感覺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和準備。國外僑民的報紙，把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在理論上提出。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與「社會革命」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以綱領觀點上與策略觀點上的激烈鬥爭預示和準備將來公開的階級鬥爭。凡群眾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報紙上找到它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中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居中的、過渡的、騎牆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各種真正階級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各自鍛鍊它們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準備來日廝殺。

革命時期（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見解，都經受群眾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為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為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領導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遊移不定的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過實際上的

檢驗。在鬥爭的自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的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與聯系——凡此種種，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如就群眾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底每一個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時期」底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反動時期（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俄皇帝制得勝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喪氣、分裂、渙散、叛變、無恥等等行爲代替了政治活動。日益趨向唯心論的哲學；神秘主義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給它們以歷史辯證法底教訓，給它們以了解進行政治鬥爭、能夠而且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朋友。戰敗之軍善學習。

俄皇帝制勝利之後，不得不趕快破壞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底殘餘。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快地前進。超階級的和非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也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越發顯著。

革命的政黨須要學習到底。它們學習了怎樣進攻。現在須要懂得，除了學習進攻的科學之外，還

須補習善於退守的科學。它們須要懂得——而革命的階級在自身痛苦的經驗中學得——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就不能得到勝利。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退却得最有秩序，它的「軍隊」損失最小，它的幹部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是否可以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最輕，它最有能力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了並驅逐了講大話的革命家，這些講大話的革命家不願了解，必須退守，必須善於退守；他們不願了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處等等組織中公開進行工作。

革命高漲時期（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漲最初發展得非常之慢，到了一九一二年連那河事變以後，便稍微快些了。孟塞維克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戰勝了莫大的困難，打退了孟塞維克。可是，如果布爾塞維克不運用正確的策略，把秘密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公開可能」配合起來，那末他們就永遠不能打退孟塞維克。在最反動的國會內，布爾塞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在這個時期內「國會」反動到了極點，在這種條件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公開參加國會而得到極大的益處。布爾塞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在國外僑民底報紙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

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完全表現出來。第二國際中的書齋與老太婆，趾高氣揚，嘲笑俄國社會黨內「派別」之複雜與鬥爭之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可能取消以後，他們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秘密）交換意見，自由（秘密）得出正確觀點這種事情，都不能組織起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國直爽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壞的叛徒。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勝利，其中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便無情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註二）底見解，意大利的徒拉梯等，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齷齪，而群眾後來本著自身的經驗，日益相信布爾塞維克底見解是正確的。

俄國第二次革命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俄舊曆二月至十月）。這個時候，俄皇政府異常零落和凋敝（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之打擊和負擔），這就造成一種非常的破壞力，去破壞俄皇政府。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戰爭的環境裏）都要自由些。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澈底的國會主義的」共和國內的一樣，出來組織政府，從前在國會內（雖然是在反動絕頂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會使得這種領袖容易在革命中起自己的作用。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開員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底一切方法和手腕，一切論據和辯辭。我們現在讀到關於謝德曼和諾斯克，關於考茨基和希法亭，關於連菲爾和阿烏斯鐵爾里茨，關於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德列爾，關於徒拉梯和龍格，關於英國的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所寫的東西，總覺得（事實上也是這樣）都是枯燥無味的重述，舊曲老調的再唱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塞維克那裏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的機會主義者底見解，先說了出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破了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的問題上丟了醜，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丟醜與昏亂，特別厲害，所有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成見底奴隸。完全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同聲同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塞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見過了。歷史惡作劇而開了以下的玩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俄舊曆二月到十月）間，孟塞維克偽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和意義，以至破了產；現在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都產生了，它以前未有底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塞維克一樣，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正在破產。經驗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有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必然要走俄國

所走過的道路。

布爾塞維克進行了勝利的鬥爭去反對代議制的（而事實上這）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和反對孟塞維克，布爾塞維克開始這種鬥爭，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是不簡單的——絕不像現時歐美各國裏所常聽到的那種意見。在第二次革命時期底初期，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且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分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抵制立憲會議，而且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會議起，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議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既得不到勝利，也保不住這個勝利。

四 布爾塞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

敵人作鬥爭而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機會主義作鬥爭；這種機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完全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完全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也還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塞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塞維主義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知道得很清楚。

講到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塞維主義是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的鬥爭而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一切主要點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的階級鬥爭所需要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認定（並且被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的經驗所完全證實）：小有產者，小業主（這一種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群眾），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永受壓迫，並且時常急疾迅速地陷於貧苦和破產，所以容易趨於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堅忍、有組織、有紀律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被資本主義壓迫以致「發狂」的小資產者，如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穩，華而不實，最容易轉為馴服、消沉和空想，甚至轉而「瘋狂」似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它們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以前此未曾見過的形式，又發作起來的。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底一種處罰。兩種畸形彼此互為表裏。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分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比較起來都只有極小的影響，其原因，一部分當然是由於布爾塞維主義底功勞，由於它始終進行了最無情的、最不調和的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說「一部分」，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一度異常繁盛，並完全暴露了它是不正確的，暴露了它不能成為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〇三年發生時，即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同無政府主義眉目傳情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始終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群眾政黨奠定基礎時，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塞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它在三個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甚的政黨作鬥爭，即

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要點，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不能）了解，在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承認個人恐怖，個人暗殺，它以為這是它特殊的「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它是達不到目的，至於有些人「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或一般地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實行的恐怖，那末，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被普列哈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和唾棄了（註三）。第三個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為他們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却又極力模仿該黨極端的機會主義者，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上的事實，在巨大的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現在已經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一種意見是對的，就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須知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已經要求開除伯恩斯坦（註四）底黨籍，而始終繼承這種傳統的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連金之卑鄙和叛變行動※），最近似革命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所需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的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以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黨早些。無論在斯巴

達黨團（註五）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去反對考茨基、希法亭、列迭布爾、克里斯平之流底機會主義和反對他們的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現在我們來總行一看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止這一個時期，那末，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講起來，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說無政府黨人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中間所盛行的對於國家的見解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有一封信，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流行的國家觀之機會主義，可是這封信被培培爾埋藏了三十六年——由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

※ 請參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三三——三三六頁『德國工人運動中什麼東西不應該仿效』。

※※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六五——四五五頁。

請看一九三二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印行的『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第九——一四六頁。

譯者註

編輯部註

編輯部註

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它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塞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會社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塞維克，由於固執成見，不願了解有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之必要而被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出色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底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的抵制國會的成功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俄皇宣佈召集諮議式的「國會」時，布爾塞維克底立場，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塞維克派相反，曾宣佈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的確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顧計了那時客觀的形勢，在當時那種形勢之下群眾罷工將急為轉政治罷工，進而為革命罷工，再進而為武裝起義。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為着下列的問題：第一次的人民代表機關的召集，還是聽俄皇去辦理呢，還是要設法從舊政府手中奪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斷定是否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不能斷定這種形勢底發展是否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那末，抵制國會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二個很有價值的經驗，這次抵制指

明，在公開的與秘密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之下，善於拋却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的，甚至於是必要的。但是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這是極大的錯誤。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黨抵制國會，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很快的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帝制之整個歷史環境，使公開與秘密工作有互相配合之必要。現在試一回顧已經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絡，已完全表現出來），就特別明顯，假使布爾塞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配合起來，並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末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自然更說不到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

一九一八年不曾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團體或「小組」，

※ 凡論及個人者——稍加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的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是不會有的。聰明的人所犯的錯誤是不很重大的，同時他能夠迅速地敏捷地糾正這種錯誤。

而且爲時不久。就在一九一八年內「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曾以爲布列斯特和約，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有害的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這的確是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正是這種妥協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所採取的策略的時候，或者當爾斯白雷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職工會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這一段話的時候，我總是首先使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假如你底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交出了你底錢護照、手槍、汽車。你因此才得幸免。這當然是個妥協。「Do it, dear」（「我給你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安全脫身」）。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打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國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輩（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奧國的鮑威爾與阿德勒爾（更不用說連聶拉墨這一班先生們），法國的列諾迭里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黨人」（註六））等，他們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

妥協起來，以反對本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是同強盜打夥。

結論是明白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幼稚氣，我們甚至難於同它認真。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爲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要善於具體識別那種妥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爲的，因此便要用全力去批評，要鼓無情地加以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這些具體的妥協宣戰，不許那班富於經驗的、一務小失大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教徒發出一一般可以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職工會「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叛賣行爲和實行這種妥協的責任，而他們底妥協的確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與販賣行爲。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怎樣把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以便減少強盜的遺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夥分贓。在政治上，這一點決不時常都像孩稚氣的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析。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想出一個包醫百病的藥方，或者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他便只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要很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

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妥協的政黨，自一九一四年來，已在事實上造就了它的國際

主義。它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俄皇帝制底失敗，它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主張。這一個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到西北利亞去充軍。革命繼起，打倒了俄皇帝制，建設了民主共和國，這就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它絲毫不和「自己的一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準備了把他們推倒，並且已經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把地主與資本家底財產，盡行沒收無遺。這個政黨既公佈和撕破了帝國主義者的密約，又向一切民族建議和平，及至英法帝國主義者不接受和議而布爾塞維克已經竭盡心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的暴力之下。這樣的黨，在這樣的環境內，締結了這樣的妥協。這種妥協之完全正確，在一般人看來，已經日益明白和顯著了。

俄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一樣），他們一開始就實行叛賣，他們直接或間接主張「保護祖國」，即主張保護本國的掠奪的資產階級。他們繼續叛賣，而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先勾結克倫斯基與立憲民主黨，後來又勾結高爾察克與鄧尼金，正如他們的國外同道勾結各該國資產階級一樣，都是投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敵。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

五 德國共產黨底「左派」領袖、

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說到的德國共產黨人，自己不稱爲「左派」，而稱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底一切症候，這從下面的說明便可以看得清楚。

有一本表現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之分裂」，是由「馬依諾河畔弗朗克福爾特地方的小組」出版的（註七）；這本小冊子把反對派意見底實質，表現得最爲顯著、真切、明瞭而簡括。只要引證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來，這個過渡時期（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的執行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努力實現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無產階級底專政呢？」。（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往下著者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的（包括參加國會）問題」，這只是一種掩飾，而真正的主

要的圖謀却是要與獨立黨聯盟。

這本小冊子接着說道：

「反對派已另選別路，它以為共產黨統治與黨專政的問題，只是一個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的統治，總是政黨各種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黨的一切設施，黨底組織，黨底鬥爭形式，黨底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點。因此，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主義這種鬥爭形式，凡是實行迂迴和通融的政策，都應予以十分堅決的排斥。」

「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方法，應特別注重。為的使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在共產黨指導之下進行革命鬥爭起見，務須建立有最廣大基礎，有最廣大範圍的新組織形式。一切革命份子所匯集的這個地點，便是以工廠中的組織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聽從一退出職工會！一號的工人，都應當集合於此。在這裏把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這種隊伍。至於以後鬥爭的群眾之政治教育，鬥爭中的政治指導，則是站在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因此，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互相對立：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企圖從上面來組織革命鬥爭，並支配這個鬥爭，它採取妥協政策，主張國會主義，以便造成一種局面，使得他們可

以參加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另一個是群眾底黨，這個黨等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它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和採用一種明確的走向目的去的方法，排斥任何國會議主義的和機會主義的方法；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顧忌的推翻資產階級，以便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去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底專政——這裏是群眾底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口號。——這就是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底最主要的立場。

每個布爾塞維克，只要曾經自覺地參加過或親近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塞維主義的發展史，他讀到這一番議論之後，便立刻要說：「這是何等陳腐的，早已聽見過的廢話，這是何等『左』的孩稚氣！」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來考察這種論調。

「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還是群眾底專政（群眾底黨）？」僅僅這一種發問，就已經證明他們思想錯亂到了什麼地步。這些人自費心力，想入非非，結果弄巧反拙，誰也曉得，群眾劃分爲階級；談論群眾和階級時，是可以把這兩個名詞彼此對立起來的，不過一個只是指一般極大多數的人民，並不區分他們在生產中的社會地位；另一個却是指在生產中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類別；在大多數地方，至少在現代文明的國家裏，階級通常由政黨來領導；按一般通例，政黨又

是由最有聲望、最有威信、最有經驗、被選到極負責地位的、稱爲領袖的人們所形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領導。這都是初步常識。這都是簡單明瞭的事情。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花槍。偏要這樣來標新立異？一方面，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秘密狀況之迅速遞變，破壞了領袖、政黨以及階級中間的通常的關係，於是人們陷入困難狀況而弄得莫名其妙。在德國及歐洲其他的國家，人們太習慣於公開生活，習慣於按期由各政黨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的手續自由自在地選舉「領袖」，習慣於用簡便的辦法，如國會選舉、群眾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等等，來檢閱各政黨影響下的群眾究竟屬於什麼階級。革命風暴緊張起來，國內戰爭日益進展，因此不得不棄去通常的工作形式，而急趨於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以便提出或推出或保留「一批領袖」——這個時候，人們就張皇失措，於是想出一種超自然的荒謬絕倫的理論。大概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註八）自己弄得莫明其妙，張皇失措，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因爲他們不幸生長於小國，在那裏他們的地位特別優越，公開狀況特別穩固，他們享慣了這種條件與傳統，從來不會見過公開狀況與秘密狀況之互相更替。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摭拾一些「領袖」、「群眾」這類現代「時髦」名詞，不加思索，隨便亂用。這些人時常聽到了並且呆板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會想一想彼此間的關係，不會認清實情。

在帝國主義大戰末年以及大戰之後，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群眾」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特別表現得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反復說明過。英國底舉斷地位使「群眾」中產生一部分半市儈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工人貴族的領袖——總是投奔資產階級方面去，為資產階級——直接地或間接地——所豢養。馬克思之所以被這班混蛋所仇恨，就因為他公開指斥他們為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替有些先進國家創造了脫斷的特權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賣階級的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只願自己本行底利益，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機會主義的政黨，因此就脫離了「群眾」，就是脫離了最廣大的勞動者，脫離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戰，不揭破、糟蹋、驅逐這班機會主義的賣階級的領袖，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就進行了這種鬥爭的政策。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講來講去，講到一般地要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這却是可笑的荒謬與愚蠢，尤其可笑的，就是在「打倒領袖」這個口號的掩飾之下，事實上却推出一些專講超自然的怪話之新領袖，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具有凡人見解的舊領袖。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沃里夫赫木、霍爾聶爾、什列迭爾、文迭爾、額列爾索。額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根本上不需要，宣佈政黨具有「資產階級性」，這真是荒謬已極，我們只有對他搖頭。這真是：如果固執錯

誤，用各種深刻理由來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總是可以弄成極大的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底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

※ 「共產主義工人報」（註九）（漢堡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上額列

爾著：「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

「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民主，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但不先破壞政黨，就必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

拉丁各國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頭腦最昏亂的人物，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莊重的德國人——額列爾及普爾菲爾在上述報紙所發表的文章中，特別莊重地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却特別可笑地說出荒謬絕論的說話，顯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也發表這種完全不合適的議論。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俄國常常是一種「時髦貨色」。

來，否認黨，這就是說，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一躍而至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不是最低階段，也不是中段）。我們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走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去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階級還會多年存在。這個時期在英國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仍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趕走地主資本家便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這還要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這些小商品生產者，是不能驟然和剷平的，而要和他們共居；只有經過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可以（而且必須）改造、感化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他們用這種勢力浸漬無產階級，誘惑無產階級，不斷地使無產階級內部重新發生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散漫、個人主義、山熱心變為消沉等等陋習。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必須有最嚴格的集權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影響，以更正碎地、有效地、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這是無產階級主要的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和傳統的持久的鬥爭，流血的及不流血的，強力的及和平的，軍事的及經濟的，教育的及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一個鐵一樣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一個為本階級內全體純潔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一個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那就不能順利進行這個鬥爭。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小業主從事於日常的、瑣碎的、不

可捉摸的、趨腐化作用的活動，由於這種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原因。要有人滅弱——即使滅弱一點——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他就在事實上幫助着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反動——工會的問題，也須同時提出。但首先讓我根據俄國的經驗，再講到幾點，來結束本章。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在我們黨內過去是常常有的；我記得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五年就有過這樣的攻擊，當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可是彼得堡的中央團體已開始形成，它應當領導各區的團體。在我們黨底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有過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的「共產黨左派」的「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新鮮的、可怕的地方。這個病症並沒有危險，病後機體甚至更加強健。另一方面，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之迅速交替（由於這種交替的關係，必須特別「隱藏起來」的，特別保守秘密的，正是總司令部，正是領袖），有時會使我們黨內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是在一九二二年，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混進布爾塞維克黨底中央委員會。他使百十個最好的、最忠實的同志被捕，使他們做苦工，使他們中間許多人早死。他之所以還沒有形成大害，那是由於我們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配合恰當。馬林諾夫斯基做中央委員和國會議員，為希圖得到我們底信任起見，不得不幫助我們辦公間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俄皇帝制下面也能夠和孟塞維克底機會主義奮鬥，能夠

採用相當的掩蔽方式去宣傳布爾塞維主義的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送百十個優秀的布爾塞維克幹部去受死，去做苦工，而另外一隻手却不得不幫助我們經過公開的報章和雜誌，訓練出成千成萬的布爾塞維克。有些德國的同志，同樣是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同志，應當學會在反動工會內進行革命工作，這些同志對於上述事實，不妨好好加以思索。

在許多國家裏，就中也在最先進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無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將來也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去。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善於配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註一〇）。

※ 馬林諾夫斯基在大戰時被俘於德國。他在布爾塞維克黨當政時回俄，他立刻被捕提交法庭，我們的工人把他槍決了。孟塞維克特別厲害地攻擊我們這個錯誤，攻擊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中央委員會。但是在克倫斯基政府的時候，我們要求逮捕國會議員長洛強科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曉得馬林諾夫斯基底奸細行動，而不通知國會中的勞動派和工人，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洛強科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鄧尼金去了。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德國「左派」對此問題已決定無條件地作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用幾篇宣言和怒氣沖沖的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在這件事情上，特別「認真」和特別魯莽的，要推霍爾聶爾），便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連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德國「左派」無論怎樣相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是實在它是根本錯誤的。其中除空話外，別無內容。

為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和現在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要點，應用於西歐。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蘇聯的具體情形如下：組織在蘇維埃裡的無產階級實現專政，無產階級，又由布爾塞維克底共產黨領導，據最近黨的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共有黨員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

命以前和以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以前，甚至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註一）。我們願慮黨過於擴大，因為一般希圖升官發財、趨炎附勢、鑽營祿位之徒，必乘機鑽進政府黨內，而這些人本來只是值得槍斃的。當尤迭尼赤只隔彼得堡幾俄里，鄧尼金已抵奧勒爾（距莫斯科僅僅三百五十俄里）的時候，當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的時候，當冒險投機、趨炎附勢、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的分子無論如何不能指望加入共產黨作為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受絞刑）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一九一九年冬）我們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為工人和農民而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黨代表大會（最近一次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織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同時還有更小的機關常駐莫斯科來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與「政治局」，這兩個機關統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各有五個委員。這樣一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在我們的共和國內，未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工會。據最近這次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事實上絕大多數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都由共產黨人組成，實行黨底一切指令。因此，我們就有一般和整個講起來形式上是非共產黨的、靈活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黨

經過它得與階級和群眾密切聯系起來，經過它同時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階級底專政。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系，如果沒有它們底熱烈幫助，如果沒有它們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最不顧犧牲的工作，那末，我們不要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系，在實際上是很複雜的和很不同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者會議，與孟塞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塞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些信徒（雖然很不多），他們教唆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宣傳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怠工等等爲止。

經過職工會而與群眾聯系，我們認爲還不夠。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就是非黨的工費代表會議，同時我們用全力去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群眾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問題，從他們中間，提拔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擔任國家的職務等等。最近將人民國家監督委員部改組爲「工費監察院」的訓令中，曾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擔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此外，黨的全部工作，自然是經過蘇維埃來進行，蘇維埃包括勞動群眾，而不問其職業。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制度，就在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裡也不會夢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對

於這種大會，黨是極力注意考察的，並經過由黨特別派往鄉村去擔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得以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實行和資本主義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作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一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際上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總結構，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布爾塞維克既熟悉這種結構，又親眼看見這種結構怎麼在二十五年內從秘密的小組發展起來，他們聽了什麼「白上」或「白下」，領袖專政或是群眾專政種種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爭論，好像在那裡爭論左腳對人更有益處或是右手對人更有益處一樣。

同樣，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鄭重的、非常飽學的、非常革命的論調，在我們看起來，也是同樣幼稚可笑的笑話，他們說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工會中工作，他們說可以拒絕那項工作，他們說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設一個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概大部分是很年青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

資本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千百年內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這種職工會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月才可以而且將要發展起來成爲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包含整批生產，而不僅包含同行、同一手藝和同一職業），然後經過這些生產工會，可以去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可以去教育、訓練和培養各方面都有知識

的、各方面都有訓練的人，會做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的，它必須向這個方向走，並且定能走到，不過須要經過長久的年月。目前就企圖具體設想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這一種將來的結果，這無異於教四歲小孩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夠——而且應該——不用玄想的，不用由我們專門造就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處置辦法，都是開玩笑的，以至於是不值得提起的。

當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過渡到初步的階級團結。當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種政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群眾聯合爲一，成爲一個彼此間沒有隔膜的東西，它便不配這個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的習氣，暴露多少不問政治的傾向，多少頑固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底共同影響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上，無論在什麼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底一大進步，黨在這個時候不得不更加努力，用新的方法和新的精神——不僅用舊的方法和舊的精神——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的時期內還會是一個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

是工人必要的結合，有了這種結合，才能使全國經濟的管理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底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底手上。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害怕這些「反動色彩」，想避開它、跳過它，這是最蠢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起的那種作用，就是要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群眾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作。另一方面，倘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擱置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會成見的工人的時候，那末，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政治家底藝術（而且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了解）也就在於正確估計一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夠得到工人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充分廣大階層底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能夠教育、訓練、吸引日益廣大的勞動群眾，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裡，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地，曾經表現而且曾經表現得比俄國厲害得多。在我們這裡，孟塞維克從前在職工會裡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因為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塞維克在職工會內更是一種根深蒂固，那裡會形成職業主義的、狹隘的、自利的、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

的、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爲帝國主義所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敗壞的「工人貴族」，這個階層比俄國過去所有的要強大得多。這是無容爭論的。在西歐同頁彼爾斯、如沃、亨得遜、美爾肯、連金之徒作鬥爭，比較我們這裡同孟塞維克作鬥爭要困難得多，我們的孟塞維克，在社會地位的政治觀點上講起來，與他們完全是一丘之貉。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定要像我們過去那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底和社會沙文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們底劣跡完全揭破並把他們趕出工會爲止。如果這場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而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裡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計算這種程度，只有各個國家裡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例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幾天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可以作爲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測量器。在這次選舉中，孟塞維克一敗塗地，他們僅獲得七十萬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有一百四十萬票；贊成布爾塞維克的却有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見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兩期。*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群眾的名義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收工人群眾到

※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三一至六四九頁。

編輯部註

我們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真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正是做這種愚蠢的事情，他們由於工會上層分子的反動和反革命，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到工會中去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的工人組織！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這無異共產黨人竭力向資產階級効勞。因爲我們的孟塞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統統是資產階級派遣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反對孟塞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底工人僱員」（*Trade-Unionis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這是美國丹尼耳·德·立昂派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在反動工會內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明的或落後的工人群眾，委棄在反動領袖底影響之下，委棄於資產階級底走狗，委棄於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註一一）底影響之下。

正是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對於影響「群眾」的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怎樣濫用「群眾」這一個名詞。要想能夠幫助「群眾」，並獲得「群眾」底同情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領袖們」（這些「領袖們」，由於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所以大多數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底苛求、陷害、侮辱和追究，凡是有「群眾」的地方，便一定要進去工作。應當善於忍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

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強不拔地，忍耐地在一切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的工作，不管這些組織如何反動，只要那裡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我們就應該在裡面進行工作。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正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群眾薈萃的組織。依瑞士 Folkets Dagblad Politiskt*（註（三））（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底統計，英國職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百分之十九。至一九一九年末，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頭沒有德法兩國這一類的材料，但一般確鑿的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都大量增加。

這些事實最明白不過地說明一件事情，而且也為其他千百個例證所證實了的事情，這就是正在無產階級群眾中，在「下層」群眾中，在落後群眾中，覺悟程度和組織要求，日益增長。英、法、德有成百萬的工人初次離棄一盤散沙的現象而採取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實行的（對一般還受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所薰染的人們說）組織形式，即加入職工會，而革命的、但是沒有理智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空喊「群眾」「群眾」！——拒絕在職工會內工作！以職工會「反動」為藉口

※ 「人民政治日刊」。

※ 在原稿及第一版上都誤印為一九一九年。

編輯部註

編輯部註

而拒絕這種工作！想出一種新的、清白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成見的、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狹隘職業主義這種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有入會資格！！（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革命家更沒有理智，比他們所做的危害革命更甚的東西，再想像不出來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戰勝俄國資產階級以及協約國資產階級而得到空前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兩年半之後，就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作了蠢事，破壞了自己對群眾的影響，幫助了孟塞維克。因爲共產黨人底全部任務，就是善於說服落後群眾，善於在落後群眾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把自己與群眾隔開。

無疑的，賈彼爾斯、亨得遜、如沃、連金那些先生們，很感謝這些「左」的革命家，因爲他們像德國的「有原則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避免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會」（註一四）裡一些革命者一樣，高唱退出反動的工會並拒絕工會中的工作。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採用資產階級的任何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牧師、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擠出工會，使他們在工會中的工作做得不痛快，侮辱、攻擊和取締他們。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甚至（有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機變、機巧、祕密手段、緘默態度、隱瞞真情，以期打入工會，留在工會裡面，無論如何要在裡

而進行共產黨的工作。在俄皇政府時代，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絲毫公開的可能，但當偵探局長祖巴托夫召集反動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企圖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就派遣了我們的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什金同志，他是彼得堡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俄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裡聯絡群眾，巧妙地進行鼓動，並使工人脫離了祖巴托夫派底影響。在四歐，因公開的、立憲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特別根深蒂固，上述工作，當然較難進行。但是這種工作，是能夠而且必須有系統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一般地應當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提議責斥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舉動是不合理的，它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是有害的），同時也應當指斥荷蘭共產黨一些黨員底行動路線，因為他們——不管是直

※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三九六至三九九頁上列寧所作的論文、題名伊凡·瓦西里葉維赤·巴布什金。

編輯部註

※ 貢彼爾斯、亨得遜、如沃、連金之徒與祖巴托夫毫無二致，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西歐的服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的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接的或間接的，明目的或暗中的，整個的或部分的一——總是幫助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與第二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對於難解決的問題，不應該敷衍，不應該抹煞，而要直接提出來。我們已經向「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直接告訴了全部實情，我們向「左派」共產黨人也應當直接告訴全部實情。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再草率不過地——而且再輕浮不過地——對於這個問題作否定的答覆。他們有什麼證據呢？在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過：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主義這種鬥爭形式……我們都應予以十分堅決的排斥。」

這真是張大其辭，到了可笑的地步，這顯然是不正確的。一回頭再去採用「國會主義，難道德國竟已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嗎？似乎還沒有吧！怎麼說得上一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講空話麼？

國會主義是「歷史上過時的」。在宣傳上講起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曉得，從宣傳到實際取消國會主義，還相隔很遠。在幾十年前，已很可理直氣壯地宣佈資本主義是「歷史上過時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作很長期和很持久的鬥爭。就全世界歷史上講來，國會主義已經是「歷史上過時的」，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主義底時代已告終結，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計算的。遲早十年或二十年，在全世界

歷史上的尺度上看起來，是無足輕重的，從全世界歷史上看起來，這不過是滄海一粟。可是正因為如此，所以講到實際政策問題的時候，援引全世界歷史尺度，這却是極大的理論錯誤。

國會主義已經「在政治上過時」了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這是對的，那末「左派」底立場是很穩固的。可是這一點應該用極認真的分析去證明，但是「左派」連試行分析的門徑都摸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一期上（*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923）（註一五），載有「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式的「左傾」或「左」的荷蘭派底意見，他們的分析，在下面我們可以看見，也是十分不行的。

第一：大家都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左派」就已認為國會主義在「政治上過時」了，這種意見完全與盧森堡、李卜克內西這種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大家都知道「左派」是錯誤了，只這一點，就已立刻根本推翻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的論調。「左派」應該證明，爲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毫無疑義的錯誤，現在已經不復成爲錯誤。他們絲毫不來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一個政黨對於本身的錯誤採取什麼態度，這是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用這種標準，就可以看出這個政黨是否莊重，這個政黨是否在事實上執行它對於本階級、對於勞動群眾所負擔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開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細心討論糾正錯誤的方法——這才

是一個莊重政黨底標誌，這才是履行它的義務，這才是它對於階級、然後對於群眾的教育和訓練。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去履行這種義務，不用極端注意、細心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的錯誤，這樣就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而只是知識份子和少數犯知識界惡習的工人底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底弗蘭克福爾特地方小組所出版的小冊子上，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以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依然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反革命的。由鄉村無產者中間產生出大批反革命軍隊。」（見原書第三頁）

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豪爽，太誇大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是確鑿的；「左派」既承認這個人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明他們底錯誤。既然「數百萬」和「大批」無產者，不僅一般地還贊成國會主義，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怎樣還能夠說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呢？可見在德國，國會主義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作是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俄皇帝制底壓迫異常野蠻而殘暴，在這種壓迫之下，經過特別長久的時間並且在特別複雜的形式之中產生了各種別派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烈、英勇、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觀察過，特別注意研究

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議員，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了時」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们所認為過時的，當作階級也認為過時，當作群眾也認為過時。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群眾底政黨自處。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群眾底水平綫上去，不應該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平綫上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逆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國會議員的成見，叫做一種成見。但是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考察正是整個階級（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正是全體勞動群眾（不僅是他們的先進分子），覺悟程度與造就程度底實在情形。

即令不是一數百萬「和大批產業工人和農業工人」，而只有人數還很多的少數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教神父，少數鄉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富農（Grossbauern），那麼，根據這一點，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在德國，國會議員政治上還沒有過時，說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參加國會議員，參加國會議員台上的鬥爭，它參加這種選舉和鬭爭的目的，正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在於喚醒和啓發鄉村中沒有知識的、畏縮的、愚昧的群眾。你們一天不能解散資產階級的國會議員和別一類的其他任何反動機關，你們便一天必須在這些機關裏工作，正因為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爲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對於我們，對於布爾塞維克，說很多好話。有時禁不住要說：你們何不少

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多認識些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我們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國會底選舉，參加了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一月的立憲會議底選舉。我們底策略是對的，還是錯的？如果是錯的，便該明白指出來，並證明我們底錯處，這是國際共產主義規定正確策略時所必須的。如果是對的，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自然，不能說俄國的狀況與西歐的狀況相等。但是「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這一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當專門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切實顧計到俄國的經驗，因為這一種話，如果不顧計到具體經驗，就很容易變成空話。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不是比西歐任何共產黨人更有權利來說國會主義在俄國政治上過時了麼？自然我們有了這種權利，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存在多久，而在於廣大勞苦群眾，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對於解散（或允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際上的準備）達到什麼程度。至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間，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因為種種特殊條件，已經有了歷史上罕見的準備，準備去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無可爭辯的確實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不曾抵制立憲會議，而且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以及奪取政權以後，都參加選舉。至於這次選舉會經得到非常有價值的（而對於無產階級是極有益處的）政治成效，那末，我敢說，我在上文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結果時，已經加以證明了。

由此，得出毫無爭辯的結論：我們已經證明，即令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之前幾星期，甚至在勝利

之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但無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使無產階級容易向落後的群眾證明，爲什麼此種國會必須解散，使得解散國會更加容易成功，使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更容易在政治上過時。如果不管這種經驗，同時却要求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的眼光來制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就是犯極大的錯誤，這正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違背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荷爾左派 不參加國會底論據。上面說到的 荷爾左派的 提綱，其中最主要的提綱——第四條——的譯文（從英文譯出）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被破壞，社會處在革命狀態之中，這時候國會方面的活動，與群眾本身的行動相較，便漸漸失去意義。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會成爲反革命底中樞，成爲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建立蘇維埃，作爲它的政權底武器，在這個時候，拒絕參加國會之任何活動，甚至成爲必要。」

第一句話顯然是錯的，因爲群眾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國會活動更重要，不只是在革命時候或革命的形勢中才是如此。這種沒有根據的在歷史上和政治上統統錯誤的論據，只是特別明顯地說明，作者全未顧到全部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以及一八七〇年革命前夜的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到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等等），也未顧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即證明配合公

開闢爭和秘密鬥爭之所以重要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的講起來是非常重要的；專門的講起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一切文明先進的國家內，很快地就要來到下列一種時候，那時，因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內戰日益成熟與逼近，百般破壞公開權利的共和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及一般資產階級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人瘋狂取締等等，所以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一天比一天須要把公開的鬥爭與秘密的鬥爭配合起來（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有了配合的必要）。這樣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左派」却絲毫不懂。

第二句話，就歷史上說來便是錯的。我們布爾塞維克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參加，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俄舊曆二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舊曆十月），不但不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此其一。第二，這句話非常違反邏輯。國會日益成爲革命底機關和中樞（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過去任何時候，國會都沒有成爲反革命底中樞而且也不能成爲反革命底中樞），而工人正在建設蘇維埃的政權武器，由這兩句話當中就得到下面的結論：即工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訓練起來，以使用蘇維埃來反對國會，用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從這裏絕不能得到結論說：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對政府的蘇維埃派的存在，因此，解散國會，反而更加困難或者並不比較容易。當我們同鄧尼金、高爾察克鬭爭的時候，我們每次都看得清

楚，在他們裏面所存在的反對他們的、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派別，與我們的勝利很有關係。我們很曉得，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俄舊曆十五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被解散的反革命的立憲會議中，站在蘇維埃方面的，有了一個徹底的布爾塞維克派和一個不徹底的「社會革命黨左派」，這並沒有使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的事情發生困難，反而使這件事情容易進行。這個提綱的作者，完全闕糊塗了，縱然不說他們把一切革命的經驗忘記了，也要說他們忘記了許多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的經驗證明：在革命期間，反動國會以外的群眾行動，與國會內同情於革命的（直接贊助革命的更好）反政府派聯合一致，是怎樣特別有益。據荷蘭人與「左派」在這裏的議論看起來，他們好像革命底教條主義者，從來不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不曾深刻探究過革命史，或者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為主觀上「否認」某個反動機關，便算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把它破壞了一般。糟蹋和陷害一種新的政治的（不僅是政治的）思想之最準確方法，便是為着擁護這種思想而把這種思想弄成荒謬絕倫。因為任何真理，如果說得「過火」（如老迪茨根所說的一樣）（註一六），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實際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弄成荒謬絕倫，而且在上述情形之下，非弄到荒謬絕倫不可。荷蘭的及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這個新真理的効勞，正是這種弄巧反拙的蠢笨行為。自然，誰要是照舊地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那也是不對的。在這裏我不能說明，在那些條件下抵制國會是有益的，因為本文任務無他，只是由

於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幾個迫切問題而顧計到俄國的經驗。俄國經驗告訴我們，布爾塞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第一次是有效的，對的（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是錯的（一九〇六年）。試一分析第一次情形，便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召集不成反動國會，當時的情形是：國會以外的群眾革命行動（罷工運動也在內）發展異常之快，無產階級與農民中沒有一部分會贊助反動政府，革命的無產階級進行罷工鬭爭與土地革命運動，因此它在廣大落後群眾中的影響有了保證。十分明顯的，這個經驗不適用於目下歐洲的情形。同樣十分明顯的，——根據上述的理由，——荷蘭人及「左派」擁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雖說這種擁護是有條件的）根本上是不正確的，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事業是有害處的。

在西歐與美國，工人階級中先進分子——革命家已特別厭惡國會，這是無庸爭辯的。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為在戰爭期間和戰後，要比國會中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所形成的最大多數更卑劣更無賴更變節的行爲，實難再想像得出。但是在解決怎樣去與公敵作鬭爭的問題時，倘屈服於深惡國會的這種情緒，那末，不唯愚蠢，而且罪過。在西歐許多國家裏，革命情緒，現時可以說是，「新奇的東西」，或者「罕有的東西」，因為人們期待這種情緒，簡直期待得太長久了，過於白費心機了，過於不耐煩了，或許因此就使他們這樣易爲情感所屈。自然，沒有群眾革命的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那就不能實現革命的策略，但我們在俄國受了長期艱苦流血的經驗，確信一個真理，這就

是革命策略不能僅僅建築在革命情緒之上。策略底規定，須根據本國（以及鄰國和世界上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力量底清醒的、極客觀的顧計以及革命運動經驗底顧計。僅僅咒罵國會的機會主義，僅僅排斥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正因為這是容易不過的事情，所以這不能解決困難的任務，更不能解決最困難的任務。在歐洲國會裏，建立真正的革命的國會黨團，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當然的。但這只是全部真理底一部分表現，而全部真理就在一九一七年歷史上非常特異的具體形勢下，俄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較易；然繼續這種革命，完成這種革命，則較歐洲各國為難。一九一八年初，我已指明這種情形，接着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明這種意見是正確的。俄國革命的特殊條件，就是：（一）當時可以把蘇維埃革命與藉蘇維埃革命來結束那使工農受盡痛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情，兩相配合起來；（二）當時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夥在全世界上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強盜間的拚命鬭爭，它們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當時可以支持比較持久的內戰，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的關係；（四）當時在農民中，有如此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運動，以至於無產階級的政黨採取了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該黨大多數是激烈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底革命要求，並因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的緣故，就立刻實現了這些要求；——這些特殊條件目下在西歐是沒有的，這種條件或類似條件之重演，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因為這個緣故（除開別的緣故不講外），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比俄國困難。要「繞過」

這種困難，「跳過」為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國會之難事，那真是十足的幼稚氣。你們要建設新社會嗎？但同時在反動國會內，由堅決忠實英勇的共產黨人建立一個好的國會黨團，你們却怕難！難道這不是幼稚氣麼？德國李卜克內西，瑞典赫格龍德，甚至沒有下層群眾底贊助，尚能用真正革命的精神去利用反動的國會，而成爲我們的模範，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的革命群眾政黨，處在戰後群眾失望憤激的情緒之下，反不能在最惡劣的國會內，鍛鍊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團嗎？正是因爲西歐工人底落後群眾，尤其是小農底落後群眾，浸淫濡染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主義的成見，較俄國爲甚，所以共產黨人，只有從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的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持久的、百折不回的鬭爭，去揭發、打消和克服這種成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內的壞「領袖」，因此悲觀失望，以至於「否認」「領袖」，到了可笑的地步。在一「領袖」們常須隱匿的條件下，要造就可靠的、老練的和有聲望的好「領袖」，特別困難，而且要戰勝此種困難，沒有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配合起來，沒有考驗「領袖」（就中也要在國會內考驗「領袖」），是不可能的。批評——而且要最嚴厲、最無情的、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用來反對國會主義或國會的活動，而應該用去反對那些不善於以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利用國會講台的領袖，更應該用去反對那些不願以革命精神、不願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國會講台的領袖。只有這種批評——同時當然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並用適當的領袖來代替

他們——是有益處的、有成績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群眾的領袖，他方面訓練群眾，使他們學會正確地識別政治情形，並學會了解從這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往往是非常複雜錯綜的任務※。

※ 我沒有很多的機會去認識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共產黨人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的小組織，袒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無疑義地，這是不對的。可是據我所得到的材料——他所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報」(第「Il soviet」(註一七)，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四期謝拉梯同志底很好的「共產主義雜誌」(「Comunismo」(註一八)，第一期至四期(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這個期間內出版)，以及幾份不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這一點就是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小組對於徒拉梯及其同道者的攻擊；因為徒拉梯等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却依然做着國會議員，繼續他們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謝拉梯同志及其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坐視容忍，這自然是一個錯誤，由於這種錯誤，也會發生與匈牙利一樣深刻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徒拉梯一流

的先生們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怠工；對機會主義的議員們所採取的這種錯誤的、不澈底的、或不堅決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產生共產黨「左派」，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袒護共產黨「左派」的存在。謝拉梯同志顯然是不對的，他指斥議員徒拉梯之「不澈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上），但真正「不澈底」的，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他容忍徒拉梯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從出版於弗朗福爾特地方的那本小冊子底引證中，我們看到「左派」何等堅決地指出這個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可憐，無疑義地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怎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他同馬克思一樣，都是那一種稀有的和極稀有的著作家，這種著作家底每部大著作中的每句話，都含蓄着極深邃的意思）反對那三十三個白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是怎樣寫的：

白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

「我們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就由於我們求達我們的目的時，並不停頓於各種過渡階段，並不去妥協，因爲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期，延長奴隸制度之期間……。」

恩格斯接着寫道：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成爲共產黨人，就因爲他們並不跳過而是經過一切爲歷史進程所形成而不是由他們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楚看到並且始終追逐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

級，並建設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生產工具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白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就因爲他們以爲：他們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那末，這件事情便算辦妥了，如果這是他們確信的「口內一動手」，政權到了手中，那末，後天「共產主義就會實現」。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就辦到，那末，他們也就不成其爲共產主義者。

「這是何等幼稚氣，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的根據！」（見恩格斯著：「白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Volksrecht*」※（註一九）上，——一八七四年出版，第七十三期。引自「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堡出版，第五十二頁至五十三頁）

恩格斯也在本文中對於瓦爾揚深致敬意，提到瓦爾揚「不可磨滅的功績」（瓦爾揚和格德從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最偉大的領袖，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都把社會主義出賣了）。但是明顯的錯誤，恩格斯却不能予以詳盡的分析。自然，在年幼而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甚至在很有經驗很有歲數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雖懂而且錯誤的勻當。並且許多論辯家（他們是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底議論正是同蘭斯贊雷同志所提到的英國機會主義的領袖底

議論一樣：「如果有爾塞維克可以同人家進行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同人家進行任何妥協呢？」但是經歷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教訓的無產階級，很能領會恩格斯所陳述的深邃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歷過罷工，有時工人要求條件，未達到，或僅達到一部分，也不得不去上工，這個時候，他忍氣吞聲，同他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妥協」。每個無產者，處在群眾鬥爭和階級衝突加劇的環境之下，很能認清兩種妥協之差別：一種妥協是爲着客觀的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窟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之革命忠心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說是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却是他們貪圖自身利益，被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懼怕害怕，自願劬勞於資本家，或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或屈服於勸說，或爲微利所誘，甘言所惑。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職工會領袖進行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國工人，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也看見了類似的現象）。

當然，也有異常困難複雜的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正確決定一個「妥協」底真實性質，——例如有些殺人案件，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爲究竟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爲（如必要的自衛），或者是不可饒赦的粗心或者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當然在政治上，各國家內及國際上各階級各政黨間之相互關係，錯綜複雜，所以有許多問題，較之辨別罷工時合理的「妥協」，或者是

工賊及賣階級的領袖所進行的「妥協」等問題，更要困難得多。要想寫定藥方，製好總規律（「不作任何妥協」），適用一切，療治百病，那就是荒謬的事情。我們要有自己的頭腦，來分別考察問題。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的領袖之作用，除其他不計外，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能夠運用思想的代表※，在長期的、堅苦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及經驗之外——政治警覺，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的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只要一般的承認可以妥協，就會抹煞機會主義（對於機會主義我們進行並且應該進行堅決的鬥爭，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各種界限。這些人們，假使他們還不曉得自然界以及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活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末，除了予以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以及閱歷政治的和生活經驗外，再無他法可以糾正。在每一個個別的

※ 每個階級中，即令在最開通的國家條件下，即令在那個最先進的、因目前形勢而能

把一切精神力彙發揚到最高度的階級中，總是有而且要階級存在，只要無產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的基礎上完全鞏固，充分發展起來，將來也必然有（不去思想）和沒有思想能力的代表。假如不是這樣，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是壓迫群眾的資本主

義了。

或特殊的歷史關頭底政治實際問題上，重要的，是善於特別提出那些不可容許的、叛賣的、機會主義的（危害革命階級的機會主義）妥協中間最主要的一種妥協之種種表現，並用盡全力去說明這種表現，與這種表現作鬥爭。當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間，兩夥同樣掠奪和同樣殘暴的國家中間進行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機會主義底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一種，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實際上便等於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大戰以後，保護那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護與本國資產階級所訂立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盟以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反對「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以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不可容許的叛逆的妥協底最主要表現，而這種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爲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弗朗克福爾特小冊子上寫道：

「……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與其他政黨作任何妥協……應當拒絕一切迂迴和妥協的政策。」
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這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指斥布爾塞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曉得布爾塞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迂迴、通融和妥協的事實！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鬥爭，較之通常國家與國家間所進行的最持久的戰爭，要困難百

倍，複雜百倍，而且時間也要延長百倍；要進行這種戰爭，而事先就拒絕迂迴、拒絕利用敵人中間的利害衝突（即令是暫時的衝突），拒絕與可能的（即令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難道這不是大笑話麼？崎嶇峻削，未通人跡的高山，如果我們不避艱險要攀登這座高山，但事先却就拒絕有時候要迂迴前進，有時候要退轉回來，有時候要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方向，「左派」底意見，同這件事情比較起來，難道不像嗎？沒有經驗，缺乏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真是因為他們年青，那還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這一類愚蠢的話），居然能夠得到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擁護）！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較資產階級要軟弱些，第一，很簡單的，就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其次又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的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嫌隙（即令是最小的嫌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一個國家內各種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利用各種可能（即令是極小的可能也好）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的，靠不住的，有條

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一般的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絲毫不懂。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際應用這個真理，那末，他就還沒有學會怎樣在革命階級的鬥爭中幫助革命階級，去把全體勞動的人類從剝削者手中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的時期，都一樣適用。

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底理論並非信條，而是行動底指南（註二〇）；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一類的「專利」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於他們不懂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上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時代以前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內舍夫斯基（註二一）就已說過：「政治的活動，並不是聶瓦街的康莊大道（這是彼得堡一條寬廣、清潔、平坦、筆直的大街）。自車爾內舍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之故，受了無數的犧牲。無論如何我們要辦到：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如落後的俄國人一樣，費了這麼高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俄皇制度未倒台以前，屢次利用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効勞，就是說我們同他們締結了許多實際的妥協；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的時候，布爾塞維主義還沒有發生的時候老「火星報」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哈諾夫、阿克雪洛德、鬧蘇里赤、馬爾托夫、坡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徒魯威（註二二）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不錯，為時並

不長)，同時我們却善於不斷地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最無情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去防止從工人運動內部發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底極小表現。布爾塞維克總是繼續採用這種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他們總是堅持工農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但同時並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複選時），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人」，作最堅決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揭破「社會革命黨人」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布爾塞維克，在國會的選舉上，曾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式訂立短期的政治聯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有好幾年內，我們在表面上與孟塞維克處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裏，但始終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把他們看作是無產階級內部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塞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如車爾諾夫、那唐松），締結過某些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美瓦特和京塔爾坐在一起開會，發表共同的宣言，但無論何時，我們都沒有停止或鬆懈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考茨基派」，反對馬爾托夫及車爾諾夫（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那時是一個完全接近我們的，幾乎與我們意見一致的「革命共產主義者」——民粹派（註二三））。正在十月革命的時候，我們會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雖然不是正式的，但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收效的）我們那時完全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綱，未加絲毫修改；這就是說我們無疑地締結了妥協，用以徵信農民，使農民相信我們並

不願挾制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協定。同時我們會向「社會革命黨左派」建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到布列斯特條約成立後，他們破壞了這個同盟，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甚至實行武裝暴動，後來更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因此，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想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便攻擊中央，我們認爲這是「左派」底輕舉妄動，這是表現「左派」錯誤的明證。我們俄國也有過孟塞維克右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他們與德國的謝德曼派類似，也有過孟塞維克左派（馬爾托夫），他們會反對孟塞維克右派，他們與德國的考茨基派相等，工人群眾之逐漸離開孟塞維克而趨向布爾塞維克，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可以顯然看到：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的票數，只佔百分之十三。「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佔大多數。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我們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爲什麼德國這一種與俄國完全不同的、工人由右而左的轉移，不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勢力，而先增強了居中的「獨立」黨，雖然這個「獨立」黨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只搖擺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

很明顯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德國共產黨人底錯誤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錯誤會在於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會和反動的工會，錯誤會在於「左派」幼

稚病底無數表現，這種毛病現在明顯暴露出來了，因此可以更好地、更快地、對於機體更有利益地加以療治。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在該黨中，除却這些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如考茨基、希法庭。其他如克里斯平、列迭布爾之流，在一定程度上內似乎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左派，無產階級的派別，這個派別發展得很迅速。該黨數十萬黨員（該黨大概一共有七十五萬黨員），是唾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布齊地方舉行的獨立黨人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建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一「獨立社會民主黨」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相反的，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找得同他們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贊助並加速與此派完全融合起來，而這種融合是必要的，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獨立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騙子，才能對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說有「容易的」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不為形形色色、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小家庭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的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沒有知識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誼、職業、有

時是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因此，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共產黨方面，就絕對地無條件地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者團體，向各種工人及小業主的政黨，採取迂迴，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問題是在於我們應當善於應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我們應當順便指出：布爾塞維克戰勝了孟塞維克，這不僅要求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採取迂迴、通融、妥協底策略，即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是如此，自然，我們所採取的迂迴、通融和妥協的辦法，都是足以幫助、促進、鞏固和增強布爾塞維克而削弱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維克也在內）必然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手段之間，搖擺於愛惜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以及其他等等。共產黨入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而不是輕視這種動搖，既欲利用，便應該對於那些傾向於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人讓步，以他們傾向於無產階級的時間和程度爲轉移，來決定我們對他們讓步的時間和程度，同時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人作鬥爭。由於我們應用正確策略的結果，遂使孟塞維主義在我們俄國過去和現在都日益瓦解，使倔强的機會主義的領袖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使最好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好的分子，都轉入我們的營壘。這是長期的過程，那十萬火急的『決議』，例如『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迂迴』，這只能妨害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底增加與力量底擴大。

末了，德國「左派」固執已見，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無疑義的錯誤之一。像何爾聶爾這一種見解，表現得愈加「有根據」，愈加「鄭重」，愈加「堅決」和愈加武斷，結果就愈加笨拙。在目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僅僅與荒謬絕倫的「國家布爾塞維主義」（拉烏芬伯爾格等，這個「國家布爾塞維主義」甚至主張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以便和協約國作戰）分清界限，是不夠的。要曉得，不許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的話）暫時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這是根本錯誤的策略。但是當謝德曼輩高踞政府的時候，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當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種條件之下，不能由於上述的緣故就說「獨立黨人」要求簽字於凡爾賽和約，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底迂迴和機變。都做得很不好，因為他們多少替叛賣階級的謝德曼派負擔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派作無情的（而且是極沉著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走到了「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不同，現在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應當信誓旦旦，聲言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否認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幹，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屢次叛賣了階級，他們這種叛賣階級的行動障礙了（而且局部的簡直是破壞了）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匈牙利聯合起來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條約，我們並不一定而且並不立刻就否認它。順利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

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障礙了這種運動，我們却贊助這種運動。問題底本質在此，根本的差別也在此。如果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把加強德國及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的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放空放過，那末，罪過就落在他們身上。德國的蘇維埃革命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却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的、牢不可破的、全世界上都有威力的堡壘）。要把解脫凡爾賽和約的問題，一定地並立刻地放在第一位，放在解放其他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國家使之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是市儈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只配考茨基、希法亭、烏托·鮑威爾這一流人信奉），而不是革命的國家主義。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國家裏——德國也在內——推翻資產階級，這對於國際間的革命是極大的勝利，爲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的話，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如果俄羅斯一個國家能夠忍受布列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而對於革命有了益處，那末，蘇維埃德意志，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絡，亦何嘗不可以忍受凡爾賽和約爲時更久而對於革命有益呢。

英法帝國主義者設法陷害德國共產黨人，替他們做好圈套：『請你們說，你們不簽字於凡爾賽和約吧』。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果然像小孩子一樣，走上圈套，他們不去巧妙地運用機變以反對狡猾的而且此刻是強於我們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事先束縛自

己的手足，公開地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而且何時同他作戰，這是愚蠢，這不是革命精神。我們事先分明看到這場戰鬥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自己，但是我們還要前去應戰，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會從事『迂迴、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己的戰鬥，那末，這種政治家，是毫無用處的。

九 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

(註二四)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却有新起的、廣大的、强有力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有極大希望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工黨、南威爾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已在彼此協商，想建立共產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之「工人無畏艦週刊」（第六冊，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註二五），由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同志主編，內載她的「走向共產黨去」一文。這篇論文敘述上列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而談判的內容，就是加入第三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來代替國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這幾個原則，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不意對於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參加國會問題及新共產黨加入舊「工黨」問題上的爭執，這個「工黨」，却是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工會式的、大半由工聯組成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與社會工黨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

※ 似乎社會工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都反對參加國會。

反對加入「工黨」，因此和不列顛社會黨全體（或者多數）黨員的意見相左，在它們看來，不列顛社會黨是英國「各種共產主義政黨中間的右派。」（見潘克赫爾斯特底論文第五頁）

總之，根本的爭執，和德國相同——雖然爭論所表現的形式（在德國所表現的形式，比在英國所表現的形式，更加接近於「俄國式」）以及其他許多情形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且有「左派」的論據。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引證登載於該期週刊上的加拉克爾同志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克爾同志以格拉茲郭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寫的（註二六），他寫道。

「這個委員會，是堅決反對國會主義的，它以各種政治組織底左派為後盾。我們代表蘇格蘭的革命運動，我們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的組織，並在全國各處，建立以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國會的議員們反目好久了。公開向他們宣戰，我們以為大可不必，而他們也害怕開始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狀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綫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底黨員群眾，想起國會二字，一天比一天更要作嘔；一切地方團體，幾乎完全贊成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名詞，是根據俄文發音用英文拼成的）或「工人蘇維埃」。當然，借政治糊口的（或以政治職業的）先生們，受到重大的影響，因此他們用盡方法，想使他們的黨員回到國會主義方面去。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所有着重點都是作者加上去的）擁護這夥匪徒。」

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只顧私人利益不顧革命利益的人底叛賣行爲。對於國會主義之任何擁護，這簡直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裏去。亨得遜、克略英斯之徒，反動已極。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精神上託命於麥克唐諾爾、斯諾烏登這一夥人底營壘。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群眾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來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們，這只是幫助麥克唐諾爾、斯諾烏登這班先生們。不列顛社會黨，在此地毫無作用……此地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明白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我們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分子以叛賣革命，那末，敬請千萬不要過問。這種反動分子久已竭盡心力希圖攫取議員的「尊號」（？——問號是作者加上的），他們非常熱心，願意證明他們和「主人翁」一樣，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一樣，能夠統治國家而得到成績。——

這一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走向共產主義的做群眾工作的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非常好。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最有價值：應當會器重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善於表現群眾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在群眾中喚起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覺悟的、未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

以愛護，應該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群眾，僅靠情緒，是不夠的，必須告訴他們說：最忠實於革命的人們要犯的或所犯的某些錯誤，乃是可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的和俄國「左的」布爾塞維克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這一切錯誤底萌芽。

這封信的作者義憤填胸，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的仇恨（然而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小百姓」都了解和接近這種仇恨）。被迫和被剝削群眾底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各種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及其成功之基礎。但是這封信的作者大概沒有顧計到，政治是一種科學，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他大概沒有顧計到：無產階級如果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所造就出來的，要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這封信底作者很明瞭：並不是國會，而只有工人蘇維埃才是達到無產階級的目的的工具，凡是到現在還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個有學問的人，是個最老練的政治家，是個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個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個最篤實的公民，是個最篤實的有身家的人，他總是一個最壞的反動者。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國會，不從國會內部來破壞國會制度，不由國會內部去準備蘇

維埃將來解散國會這一個任務上的勝利，這樣是否能夠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會想到提出這個問題之必要。但同時這封信底作者却說出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第一，科學要求顧計到其他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如果他那些（也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經歷或不久以前已經經歷過十分類似我們底經驗；第二，科學要求顧計到一切活動於該國內部的力量、團體、政黨、階級、群眾，科學絕不要求僅僅根據一個團體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絕不要求僅僅根據一個團體或一個政黨底覺悟程度與鬭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李得遜、克略英斯、麥克唐諾爾、斯諾烏登這一流人物反動已極，這是對的。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不如說他們寧可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權），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案來「統治」，他們一旦攫得政權，一定和謝德曼、諾斯克之徒如出一轍，這也是對的。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幫助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給這班先生們以相當的國會方面的幫助。爲說明這段意思起見，我引用英國目前兩種政治文件：

(一) 內閣總理魯易·喬治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說（根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 (註二七) 上面的記載)；(二) 「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在她的論文中（該論文我在上面已經提到）所發表的議論。

魯易·喬治在他底演講中，駁斥阿斯克維特（當時特爾阿斯克維特到會，但阿氏拒絕了）及其他

不願意與保守黨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山黨人（在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了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魯易·喬治證明自山黨與保守黨有聯合之必要，而且要聯合得密切，不然，則圖謀實行生產工具「公有制」的工黨，魯易·喬治一舉可把它叫做「社會黨的工黨，就能夠得到勝利。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底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底聽衆，向着自山黨底國會議員（這些人以前大概絲毫不懂）解釋道：「這在法國，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叫做布爾塞維主義」。魯易·喬治說明道，這是自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爲自山黨人根本贊成私有制度。他說：「文明到了危險的境界了」，因此自山黨員與保守黨員必須聯合起來……

魯易·喬治說：

「……如果你們去到農業區域，那末，不錯，你們在那裏所看到的，依然是舊時的黨派，沒有什麼變動，那裏離危險還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一旦到了農業區域，那裏的危險，也要和現在幾個工業區域一樣的大。吾國五分之四的居民，經營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未必有五分之一的居民。這是我想到將來危險時，始終憂慮的一件事情。法國居民大多業農，那裏有確定觀念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不很快，也不很容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們國家裏就不同了。我們國家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開始動搖起來，那末，因爲上面所講過的緣故，它將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厲害。」

讀者由這裏可以看出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聰明的人，而且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魯易·喬治那裏，學些東西。

魯易·喬治演講以後，進行討論，我們由他們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段問答，倒是有興趣的事情：

沃萊斯 (Wallace) 先生問道：「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由他們那裏得到許多幫助，內閣總理在工業區域裏對於產業工人既然採取這一種政策，請問總理實行這種政策會有什麼結果呢。目下忠實擁護我們的工人，將來不會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底勢力嗎，將來不會發生這種可能的結果嗎？」

內閣總理回答說：「我對於加強工黨的問題有完全不同的意見。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件事實，無疑義地，使得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已經有很多自由黨人，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人，現在他們以破壞政府底威信爲能事。結果無疑義的，對工黨有益的輿論大大增加着勢力。一般輿論，並不歸附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歸附工黨，補選運動，就證明這一點。」

附帶說一句，這一段話，證明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們，怎樣糊塗而不能不幹無可救藥的蠢事。資產階級就要因此滅亡。我們的人，或許也要做些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要及時改正才行），但結果我們的人終於成爲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的以下一番議論：

「……應克平同志（不列顛社會黨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中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做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一種對於工黨的意見，就黨員底數量而言，工黨是很龐大的，雖然工黨裏很大一部分黨員是不活動和不振作的。工黨就是加入工聯的男女工人，這些男女工人因為廠中的同伴是工聯底會員，同時又因為他們要想領取津貼，所以就加入了工聯。」

「但是我們承認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因為不列顛工黨是一派思想底產物，英國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現時還沒有跳出這派思想底圈子，雖然民衆底腦子裏已醞釀着極大的變化，而快要改變這種情形……」

「……不列顛工黨，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組織一樣，在社會底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然要當權執政。共產黨人底任務在於聚集力量以推翻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不應當拖延種種活動，不應當遊移。」

「我們不應當分散我們底力量去增加工黨的力量；工黨底上台執政，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須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政府派，必須有準備和決心，以便進攻工黨政府……。」（註二八）

總之，資產階級自由派，放棄他們歷史上百年來經驗所視爲神聖的——而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的兩個政黨）制，認爲必需聯合兩黨的力量，來與工黨鬥爭。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自知末日將至，跑到工黨方面來。左派共產黨主義者認爲工黨必然得到政權，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工黨。根據這種情形，他們作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用以下的話說出這個結論：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妥協……它必須保全它學說底純潔，保全它的獨立，使它不染改良主義的毒害；它底使命是勇往直前，不要中途逗留和轉折，筆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恰相反，因爲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或謝德曼這一班人走，因爲他們還沒有在這羸人底政府下面嘗過滋味，而俄國和德國，正因嘗過這種滋味，工人才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因爲如此，所以毫無疑義地，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國會，必須由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認識亨得遜和斯諾烏登政府成立後所得的結果，必須幫助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去戰勝聯合起來的魯易·喬治與徹爾赤里。如果不這樣幹，便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爲工人階級中多數人底見解不改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要發生這種改變，就要靠群眾的政治經驗，無論何時，僅僅靠宣傳，是不行的。如果現在分明無力的少數工人，知道（或者無論如何應當知道）多數工人經過一個短時期以後，在亨得遜和斯諾烏登戰勝魯易·喬治和徹爾赤里的條件之下，便會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失望，並轉而擁護共產

主義（或者無論如何，要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多半是守善意的中立），然而這少數人却說「不妥協，不中途轉折，勇往直前」；這種口號，分明是錯誤的。這好像一萬人與五萬敵人作戰一樣，他們本來應當「停留」，「轉折」，甚至於締結「妥協」，以待不能即刻出發的十萬援兵，然而他們不這樣幹，却前去與敵人拚命。這只是知識分子的孩稚氣，而不是革命階級底鄭重策略。

一切革命以及二十世紀以來俄國三次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要革命得到勝利，僅僅被剝削和被壓迫群眾覺着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這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得到勝利，還須要剝削者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只有這個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出來，就是：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革命，第一，就須要多數工人（至少也須要覺悟的、有思想能力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多數工人）完全明瞭革命底必要，並爲了革命有赴湯蹈火的決心；第二，須要統治階級遭受政府的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群眾都牽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消沉的勞動者和被壓迫的群眾中，迅速產生很多的能幹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驟增至十倍或至百倍），這種危機減弱政府底勢力，使革命者能夠很快地推翻政府。

在英國，可以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兩種條件，很明顯地日益具備，就在魯易·喬治底演說辭中，這一點，也看得出來。因此，「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因爲我們看

到有些革命者，採取不充分思索的、不充分注意的、不充分自覺的、不充分周到的態度，去對付這兩種條件底每一種。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吸引群眾（倘不如此，我們便會成爲大言不慚的空談家），那末，第一，我們就必須幫助亨得遜或斯諾烏登去打倒魯易·喬治和徹爾赤里（更確切一點說：我們必須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我們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使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相信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去認清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流人物之完全無用，認清這一流人物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階級的天性，認清這班人的必然破產；第三，我們必須使革命的時機逼近，在那個時候多數工人對亨得遜之徒失望，因此可以一舉推翻亨得遜這班人的政府，而且有極大的勝利機會。如果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大資產階級的魯易·喬治，甚至於表現張皇失措，並由於昨天和徹爾赤里「衝突」，今天和阿斯克維脫「衝突」，而日益削弱自己的力量（及削弱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那末，到了將來那個時候，亨得遜這一班人底政府更加要張皇失措、進退維谷了。

我要更加具體地來說一說。在我看起來，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把他們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一兩個更弱得不堪），在第三國際的原則上，在必須參加國會的條件下，合併起來，成爲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向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提議「妥協」，提議選舉上的協作，向他們說：我

們共同前去反對魯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的票數，來分國會中的議席（不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表決手續），同時我們各有宣傳鼓動及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和他們聯盟，因為否則便是叛賣階級；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和俄國布爾塞維克（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共十五年之久）對於俄國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即孟塞維克）所取的态度一樣，應堅持和爭得揭發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的完全自由權。

如果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於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不去爭奪議席，這件事情上儘可通融（但亨得遜之流，尤其是他們底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那些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主要的正是爲獵取議席）。我們贏了，因爲正是魯易·喬治自己「激動」群眾的時候，我們把我們的鼓動，傳達到群眾中去，同時我們不僅幫助工黨加速組織政府，而且幫助群眾加速了解我們共產主義的、反亨得遜的全部宣傳，我們將毫無避諱、毫不緘默地進行這種宣傳去反對亨得遜。

如果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拒絕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了。因爲我們立刻便使群眾看見，要注意，就在純粹是孟塞維克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群眾也贊成蘇維埃。亨得遜這一班人寧願接近資本公司，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我們馬上便在群眾面前佔了贏面，這些群眾聽了魯易·喬治那一段很正確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有益）漂亮演說之後，將特別同情

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魯易·喬治與保守黨的聯盟，我們立刻佔了贏面，因為我們在群眾面前證明了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害怕戰勝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他們偷偷摸摸企圖獲得魯易·喬治底幫助，而魯易·喬治却公然要與保守黨攜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俄國布爾塞維克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舊曆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之後，所有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就是反對俄國的亨得遜和斯諾烏登）的宣傳，正因為上述的緣故，才獲得勝利。我們那時告訴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拋開資產階級，取得整個政權吧，因為你們在黨維埃中佔多數（一九一七年六月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是俄國的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害怕拋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資產階級明明曉得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極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一定獲得多數，於是把這個選舉再三延擱下去，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却没有能力來毅然決

※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根據當時所得到的消息，其結果如下：參加選舉

者有三千六百萬人以上，布爾塞維克獲得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主及資產階級底各種政黨獲得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以及與他們一類的小團體獲得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然澈底反對這種延期。

如果亨得遜和斯諾烏登之徒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聯盟，共產主義者立刻就佔贏面，而獲得群眾底同情，並使亨得遜和斯諾烏登之流喪失信用，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個議席，這對於我們也無足輕重。那時我們只在極少數的極端可靠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底候選人，即是說，我們候選人的提出，不至於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那時我們進行選舉的宣傳，散發傳單以利於共產主義並在我們沒有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請選民投票贊成工黨黨員而反對資本家。潘克赫爾斯特和加拉克爾兩個同志，以爲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或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叛徒放棄鬥爭，那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義地可以因此得到好處。

英國共產主義者，現在甚至於接近群眾，甚至於要群眾聽他們的話，都時常感覺爲難。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說話，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得遜而反對魯易·喬治，便管保群眾會聽我的話。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比國會好，無產階級專政比撒爾赤里專政好（撒爾赤里這種專政是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招牌來掩飾的），而且也可以說明我要投票贊成亨得遜，我提攜亨得遜，這無異絞索提攜絞犯一樣；此外我又可以說明亨得遜這一班人組織自己政府的時候快到了，他們行將執政，這也要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也要使群眾轉到我這方面來，也要促進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班人在政治上的死亡，好像俄、德兩國裏他們的同道所遭遇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種策略太「狡猾」，太複雜，群眾不會了解它，它要分散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礙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如果有人出來說這種話，那末，我便要對這般「左的」反對者說：不要把你們底教條主義的高論，推發在群眾身上！俄國群眾底文化程度，顯然不較英國為高，而較英國為低。但群眾了解了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底前夜，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曾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以備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立憲會議），而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舊曆十月），布爾塞維克又舉行了到明年一月十八日（俄舊曆五日）被他們所解散了的立憲會議底選舉，這種策略並沒有妨礙布爾塞維克，而且還幫助了布爾塞維克。

英國共產主義者中間第二種爭執就是是否要加入工黨，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此不能多說。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太少了，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為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本身結構上，過於不像歐洲大陸的普通政黨。不過毫無疑義地可以說，第一，有人認為「共產黨必須保全它學說底純潔，保全它的獨立，使它絲毫不染改良主義的毒害；它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不要中途逗留和轉折，筆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如果有人根據這一類原則，而想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末，他在應否聯合「工黨」的問題上也要犯錯誤。因為這一類原則，只是重演法國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錯誤，這些公社社員在一八七四年宣稱「否認」各種妥協和各種過渡階段。第二，毫無疑義的，這個問題上的任務，也和任何時候一樣，就是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和根本的原則，應用到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

關係底特殊情形上去，應用到向着共產主義走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形上去，而這些特殊情形，爲各個國家所固有，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揣摩這種特殊情形。

然而我們不僅講到英國共產主義運動時，須要講到這一點，而且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做一般的結論時，也要講到這一點。現在我們就來講這個問題。

一〇 結 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形成世界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在一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罷工運動底範圍和力量爲世界歷來所僅見。只在一九〇五年正月一個月內，罷工的人數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起來每年罷工的人數，增加了十倍，自一九〇五年正月到十月，罷工不斷增多，而且日形擴大。在許多十分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影響之下，落後的俄國，不僅首先向全世界昭示被壓迫群眾在革命時所表現的獨立精神驟然增長（這點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昭示出無產階級底作用比較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不知要大多少倍，昭示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底配合，由政治罷工進入武裝起義的轉變，以及受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中群眾鬥爭及群眾組織底新形式底產生——蘇維埃底產生。

一九一七年底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使蘇維埃在全國各地盡量發展起來，後來就使蘇維埃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當中得到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表現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就表現出這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就表現出蘇維埃底歷史使命是要做資產階級國會制度

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與繼承者。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底歷史，現時證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要（而且已經開始）經過日益生長的、日益強健的、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底鬥爭，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塞維主義」，就是與機會主義及社會沙文主義作鬥爭；第二，是與共產主義「左派」作鬥爭（這可以說是補充的一種鬥爭）。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經開展起來，這種鬥爭乃是第二國際（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已經被打死了）與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份，固執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些組織差不多全體，差不多一律承認蘇維埃制度），以及在法國（前工團派底一部份，對於政黨及國會主義，採取不正確的態度，同時他們也是承認蘇維埃制度），都可以看到，就是說，毫無疑義地，非但在幾個國家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進行實質上相同的準備以便戰勝資產階級，但各國工人運動在這件事情上的發展，却各個不同。並且大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走這一條道路，比布爾塞維主義快得多。布爾塞維主義成爲有組織的政治派別以後，在歷史上有了十五年時間的準備，才獲得勝利。第三國際在一年的短時間中，已經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那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在幾個月前，還好似龐然大物，不知比第三國際強大多少倍，享受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的直接

的、間接的、物質的（關員高位、護照、報章）和思想的贊助，而今却被第三國際擊破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各國共產黨人，要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及「左派」教條主義作鬥爭的根本上、原則上的任務，同時要十分覺悟地顧計到由於各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如愛爾蘭等）、殖民地、宗教派別種種特點的關係這場鬥爭所採取的而且必然應當採取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之不滿，而且這種不滿，繼續擴大和增加，這是由於第二國際犯機會主義，也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創立真正集權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夠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運用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上的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這種基礎上面。各民族間各國家間的民族的和國家的差別一日存在（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長地存在），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特異之點，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癡人說夢），而是要去正確應用共產主義底根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得到正確的枝葉的形式上的變更，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當每個國家採取具體的辦法，以便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以便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與「左派」教條主義，以便推翻資產階級，以便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應當考察、研究、探索、揣摩和捕捉民族的特點，這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

主要任務。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這個先鋒隊贊助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國會主義，贊助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在這個問題上，主要的事情（自然全部的事情還差得很遠，然而主要的事情），是做到了。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精神集中在下述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看來好像比較次要——在某種觀點上看去，也的確比較次要——但在實際上，却更加接近於任務底實際解決。這個步驟就是要找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

我們在思想上，已經取得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沒有辦到這件事情，那就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情離開勝利還很遠。僅靠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群眾，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贊助的立場，這個時候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所壓迫的勞動群眾都站上這種立場，僅靠宣傳，僅靠煽動，是不夠的。還要有群眾自己的政治經驗。這乃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條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文化低落，往往目不識丁的俄國群眾，即文化程度很高，個個都識字的德國群眾，也須親身閱歷一番，目睹那第二國際英雄們所組織的政府完全軟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專門獻媚於資產階級，十分卑鄙醜惡，目睹那極端反動派——俄國底柯爾尼洛夫、德國底卡普之徒——底專政是完全不能避免的（就是說：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是極端反

動派專政，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然後才會決心走向共產主義。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團體，共產主義的派別，它們目前的任務，是要善於率領廣大群眾（而現在廣大群眾往往還是酣睡、消沉、守舊、暮氣沉沉，而沒有醒悟）走上這種新立場，確切一點說，是要不借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也要善於領導這些群眾，以便他們轉上、接近新立場。如果當時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那末，第一個歷史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的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的任務），就不能解決；如果不能取消「左的」教條主義，如果不能完全克服和糾正「左的」教條主義底錯誤，那末，目前第二個任務，即善於率領群眾走上新立場（這種新立場能夠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勝利）的任務也不能完成。

既然在過去的時候，我們應該吸引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所以宣傳便佔第一位（現時在相當的程度內亦復如是）；在這一方面講起來，甚至那些政治研究組雖然帶着研究組的一切弱點，也是有益處的，也可收得成效的。但是到了群眾實際行動的時候，要安排百萬大軍，假使可以用這個名詞的話），要佈置目前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僅僅宣傳的老辦法，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此時，不能只計算到幾千人，像不會領導過群眾的小組宣傳員本來所計算的一樣；此時應當計算到幾百萬人 and 幾千萬人。此時我們

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底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一定要一切階級，毫無例外）在歷史上發生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這樣佈置，以至於決戰時機已經完全成熟起來，以至於下列條件已經具備：（一）仇視我們的一切階級力量，已充分錯亂，他們彼此之間已搏戰到充分程度，已因力不勝任的鬥爭，弄得精疲力盡；（二）一切動搖的、不穩定的中間份子，即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民衆面前，充分揭破了自己，已因實際上的破產而丟醜；（三）在無產階級中，群眾熱情，已經開始並且日益高漲，去贊助極堅決極勇敢的革命行動，去反對資產階級。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時機才算成熟，只有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正確顧計到上面簡括敘述出來的條件並正確選擇時機的話，我們的勝利，才有保障。

一方面徹爾赤里派和魯易·喬治派（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些少的民族特點）中間的差別，另一方面亨得遜派和魯易·喬治派中間的差別，從純粹的共產主義，即抽象的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熟到實際的、群眾的、政治行動上的共產主義底觀點上來看，固然無足輕重。但從群眾實際行動底觀點上來看，這種差別是極端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要做一個覺悟的、篤信的、思想上的宣傳家，而且要做一個革命中群眾底實際領導者，那末，他的整個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估量和確定這些「朋友們」中間不可避免的、使得所有這些「朋友們」一齊削弱的衝突，究竟在什麼時候會完全成熟。要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誠心，與善於從事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迂迴、通

融、轉折、退却等等的才具，二者融匯起來，以便促進亨得遜這一班人（如果不舉出人名，那末，就可以說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就可以說先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政權之實現與倒台；促進他們實際上必然的破產（而這種破產正是用我們底精神，正是向着共產主義這個方向去教導群眾）；促進亨得遜派——魯易·喬治派——徹爾赤里派中間（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派——君主專制派中間；謝德曼派——資產階級——卡普派中間等等）必然的衝突、爭執、糾紛和完全決裂；並且要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底柱石」中間決裂得最厲害的時機，以便進行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去擊破所有這一班人並奪取政權。

一般的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比最先進階級底最好政黨、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內容總是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最好的先鋒隊，也只是表現幾萬人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實現革命的（在人們的一切能力特別興奮和緊張的時候），却是最激烈的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領會和使用一切（絲毫不能除外）社會活動底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要去完成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未完成的事情，然而有時候却要冒很大的危險）；第二，革命階級，須時時準備，以便極迅速地、突然間地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別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倘不準備學會使用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各種武器，各種鬥爭手段和方法，那末誰

也要承認這個軍隊態度，是愚蠢的，或者甚至於是罪惡的。這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甚。在政治上，在將來種種不同的條件之下，究竟那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適用和有利，我們事先愈加難以知道。倘若我們不能使用一切鬥爭手段，那末，當別些階級的狀況，發生不以我們意旨為轉移的變動，而提出我們所特別見拙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如果我們善於使用一切鬥爭手段，那怕當時情形不容許我們採取最厲害的、最快不過的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那種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得到勝利，因為我們代表真正先進的眞正革命的階級底利益。沒有經驗的革命者，時常以爲公開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這一方面常常（尤其是在非革命時期，在「和平」時期）欺騙了和愚弄了工人：他們時常以爲秘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這是不對的。是的，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最自由民主的國家裏，資產階級極無恥地和極厲害地欺騙了工人，禁止人們談論眞理——談論大戰的強盜性質，在這一種條件之下，那些不能和不願（請你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願」吧！）採用秘密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革命者，如果不會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那末，他們便是極不好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爆發並擴大了的時候，誰都參加革命，有的只是由於狂熱，有的是由於趕時髦，有的甚至由於鑽營個人利益，這時做一個革命者，並不爲難。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經過多少困難，受盡千辛萬苦，才能「解脫」這一種可憐的革命家。當

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群眾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還沒有來到時，而善於做一個革命者，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看清革命行動方法之必要的那些群眾中，捍衛革命底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了——也有價值得多了。善於尋找，探索，正確斷定使得群眾接近真正的、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的、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曉得——任何人事先都不能斷定——英國什麼時候才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總是最足以喚醒和掀起極廣大的、目前還未驚醒的群眾去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我們的一切準備工作，以便四隻足都裝上鐵蹄（像已故的普列哈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一樣）。或許國會危機可以引起「山崩海裂」，或許山極紛亂的、日益險惡和劇烈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第三種以及其他的事變，都可以引起「山崩海裂」。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那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共產黨人底疑慮，這個問題，我們大家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切實解決了），我們所說的，是那一種緣由，將來會喚起目前還是沉睡的無產階級群眾，去動作起來，並使得他們緊緊迫近革命。我們不要忘記德列伊福斯案底陳例，當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無論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要比現時少一百倍，但是只要有這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只要發生反動軍閥千百棒無

恥行爲中之一樁（德列伊福斯案），就足以使人民緊緊迫近國內戰爭！

由此在英國共產主義者既須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和不偏倚地去利用國會選舉，又須利用不列顛政府對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全世界帝國主義政策上底一切變故，利用社會生活底其他各部分和各方面，在各部分和各方面都按照新方法，按照共產主義的方法，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而是用第三國際底精神來努力工作。我在此地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來描寫「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的」參加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底方法，但是我可以切實告訴國外的共產主義者說，俄國的國會選舉運動，與通常西歐的國會選舉運動，完全不同。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裡，國會主義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各國的站在第三國際方面的人，正是要在各方面，在生活的各部分上，把那舊的、社會黨的、工聯派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改變爲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共產主義者之所以生存在世，正是爲着這件事情。在俄國底選舉裡，也始終有過很不少的機會主義的行爲，純粹資產階級的、不顧大局的、偽詐騙人的資本主義的弊端。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創造一種新的、不尋常的、不是機會主義的、不是貪圖祿位的國會主義：以便共產主義者底政黨提出自己的口號，以便真正無產者得到沒有組織的、備受壓迫的貧民底幫助而散發傳單，走遍工人底宿舍，走遍鄉村無產者和僻野（幸而在歐洲，窮鄉僻野，要比俄國少許多倍，在英國尤少）農民所住的茅舍，去到最平民式的茶樓酒肆，

參加最平民式的會社和不時的集會，同民衆說話時，不要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過於用國會的語氣），絲毫不要爭逐國會的「議席」，而要到處啓發思想，吸引群衆，揭破資產階級底食言，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舉行的選舉，所發表的告全體民衆的宣言，在選舉時，利用平素（在資產階級底統治下）得不到的機會（自然要除去大罷工底機會以外，因爲在俄國大罷工的時候，這一種鼓動全民的機關，工作得更加緊張），來使群衆盡量認識布爾塞維主義。在西歐和美國要進行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十分困難的，但是這些事情是可以進行而應該進行的，因爲不費力，共產主義底任務，就根本不能解決，要解決一天比一天愈加複雜的、一天比一天愈加和社會生活各部分聯系起來的、一天比一天愈加要由資產階級手中節節奪取社會生活各部門和各方面的實際的任務，就應當費力。

就在英國裡，在軍隊中，在「自己」國家底被壓迫的和不平等的民族中間（如愛爾蘭、各殖民地），宣傳、鼓動和組織底工作，也應當按照新方法和新精神（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法，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法，不是用改良主義的精神，而是用革命的精神）來進行。因爲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而現時是在大戰之後，當各民族受到戰爭的痛苦，急速張開眼睛去認識真實情況的時候（而這種真實情況，就是幾千萬人陣亡和變爲殘廢，只是爲的解決一個問題：英國強盜，或德國強盜，究竟那一個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釀起衝突引起危險，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無數火星到

處橫飛。我們不曉得，而且不能曉得，到底那顆火星將燃起大火，把群眾特別從酣睡中喚醒起來，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到各方面，甚至去到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沒有希望的方面，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便不能勝任裕如，便不會知道各方面的情形，便不會使用各種武器，我們既沒有準備就緒以便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將社會生活底各方面建設了，——而現在也把它們破壞了），又沒有準備就緒以便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法去改組全盤社會生活。

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獲得出乎資產階級及庸俗分子意外的勝利之後，全世界換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換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爲，『布爾塞維主義』所嚇倒，它痛恨『布爾塞維主義』深入骨髓，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它一方面使事變急轉直下，而另一方面，却聚精會神，用暴力來鎮壓布爾塞維主義，因此它在其他許多方面，削弱自己的陣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應當顧計到這兩種情形。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布爾塞維克的時候（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間攻擊得愈加兇猛），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唱起各種腔調，大罵布爾塞維克的資產階級幾百萬份報紙，却幫助了喚起群眾去估計布爾塞維主義；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正由於資產階級的『熱心』，都議論紛紛，講到布爾塞維主義。現在各國的百萬富豪在國際上的行動，我們不得

不對他們心感。他們盡心竭力攻擊布爾塞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一班人無異；他們做這件事，也和克倫斯基一樣，做得「太過火了一，也一樣幫助我們。法國資產階級譁蟻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信仰布爾塞維主義，它把布爾塞維主義做成選舉運動的中心；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把成千成萬的人，認為有布爾塞維主義的嫌疑，大肆逮捕，到處捏造謠言，說布爾塞維克陰謀不軌，這樣就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資格最老的」資產階級，不管它怎樣聰明，不管它怎樣富於閱歷，却做出人們想像不到的蠢事，它建立經費極充足的「反布爾塞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評論布爾塞維主義的書報，添雇很多的學者、鼓動家、牧師，去和布爾塞維主義奮鬥；我們對於這些資本家先生們，應該鞠躬鳴謝。他們替我們効勞。他們幫助我們，使群眾來注意布爾塞維主義底實質和意義究竟是什麼。本來他們也就不能有別種作爲，因為要想默不作聲，剷除布爾塞維主義，他們已經辦不成功了。

然而，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看見布爾塞維主義底一方面：只看見武裝起義、強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準備在這一方面，設法抵抗。在個別情形之下，在個別的國家裡，在某種短促的時期內，資產階級或者能夠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顧計到這一種可能，然而資產階級能夠達到這種目的，這對於我們，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真正從社會生活底各方面「發育起來」，它的萌芽真正到處都有。「共禍」（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用的最「快意」的名詞）已經深深浸入俄

體並侵蝕全部機體。如果特別小心謹慎，「堵住」一個出口，「共禍」却從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出口迸發出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資產階級儘管東奔西走、兇惡狂暴、做出過火的行動和愚蠢的事情，預先報復布爾塞維克，設法再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個、幾千個、幾十萬個明天的或昨天的布爾塞維克；資產階級這種行動，和以前被歷史判決死刑的一切階級底行動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無論如何，將來的世界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不僅僅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而且要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計算資產階級底瘋狂奔走，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把這種熱情和計算兩者融合起來。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殘酷地被撲滅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布爾塞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因為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保皇黨的將軍用極巧妙的詭計和欺詐的手腕，以至於被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然而在各種情形之下，在一切國家之內，共產主義都日益鞏固，日益發展；它居然這樣根深蒂固，以至於取締並沒有削弱共產主義，反而加強共產主義。要使我们更加有把握和更加切實地走向勝利，我們所缺少的，只有一點，這一點就是：一切國家底一切共產黨人，都要澈底覺悟到必須使我們的策略盡量靈活。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特別是在各先進國家內，目前缺乏這種覺悟，缺乏在實際中實現這種覺悟底能力。

那飽學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從前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如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

底破產，可以（而且應當）做很有益的教訓。從前他們完全覺悟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了馬克思底辯證法，而且轉授別人（從前他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其中有許多，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上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辯證法的時候，却犯了這樣大的錯誤，或者說，他們在實際上成爲這樣一種非辯證論者，成爲這樣一種不會顧計形式底迅速改變、不會顧計新內容迅速充實了舊形式的人，以至於他們底命運與甘特曼、格得和普列哈諾夫相差無幾。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只「呆呆注視」一個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面不全的，他們害怕看見那些因客觀條件之故而必然發生的急遽轉變，却依然口口聲聲，說那種簡單的、背熟的、第一眼看去是很明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雖然也像算術，却更加像代數，雖然也像初等數學，却更加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充實了新內容，因此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學究却固執成見，他們過去和現在依然在那裡勸說自己並說服別人，硬說「負三」大於「負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主義者，不要從另一方面弄出同樣的錯誤，更確切一點說，「左的」共產主義者從另一方面弄出來的同樣的錯誤，要趕快加以糾正，要迅速地、使機體不至於大受損害地加以消除。不懂右的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左的」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的」教條主義底錯誤，比較右的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底錯誤，其危險性與嚴重程

度，當然要小一千倍，然而，此中緣故，只是由於「左的」共產主義運動，還是很年幼的、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為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才容易醫治，因此，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着手醫治這種病症。

舊形式破裂了，因為舊形式裡面的新內容——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發展到無法包容的地步。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底觀點上看來，我們現在有這樣堅固的、這樣強大的、這樣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以至於這種內容能夠而且應該表現在任何形式上，既表現在新的形式上，又表現在舊的形式上，它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征服一切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要與舊的形式調和，而是要善於把一切舊的和新的形式變為共產主義獲得完全的和最後的、堅決的和不可反覆的勝利所使用的武器。

共產主義者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的發展，走上最直接的、最輕便的道路，以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得到勝利。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多走一小步——似乎這一步依然是照原來的方向的，——真理便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的和英國的「左的」共產主義者一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路，我們不准迂迴、通融和妥協，這便是錯誤，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害處，而且局部地已經使得共產主義，現在也使得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害處。右的教條主義固執成見，僅僅承認舊形式，而沒有看見新內容，因此完全破

產了。『左的』教條主義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它看不見新內容經過一切和各種形式而開闢自己的道路，它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善於學會使用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速度，用一個形式去補充別個形式，用一個形式去代替別個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各種不是我們的階級、或者不是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變化。

全世界的革命，已因帝國主義全世界大戰中的慘酷狀況與下流行爲，已因大戰所形成的沒有出路的情形，而受到如此强有力的推動和加速，——這個革命，在範圍和深度上講起來，發展得這樣迅速，具有這樣豐富的變化形式，供獻這樣有教訓意義的、這樣實際的、駁倒各種教條主義的論證，以至於我們有十足的根據，來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犯的『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可以很快地完全醫治好。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完稿。

增

補

當我們國家（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報復無產階級革命，因此把我們的國家掠奪一空，他們對本國工人所說的任何約言，一概置諸不顧，而繼續掠奪和封鎖我們的國家）底印刷局設法印行我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從國外得到了一些補充的材料。我並不把這本小冊子看作什麼大著作，而只是把它看作政論家底短評，可以隨便增補，因此我要簡括地講到下列幾點。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已成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外組織「共產工黨」，以示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要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說「好像」，因為我僅僅有左派的報紙「蘇維埃」(L'Unità)新到的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在這兩期報上公開討論分裂底可能與必要，同時也講到「懷疑派」（註二九）（或抵制派即反對參加國會的一派）底代表大會，而這一派直到現在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的。

與「左派」，即與「反國會派」（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反對職工會內的工作）實行分裂，好像我們過去與「中派」（或考茨基派、龍格派、「獨立工黨」等等）實行分裂一

樣，也許要成爲國際的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要比觀念不清好些，因爲觀念不清阻礙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阻礙黨的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和國際的舞台上，在事實上親身去閱歷一番吧，讓他們沒有嚴格集中的和遵守鐵的紀律的黨，沒有駕御各方面、各部門、各項政治工作與文化工作的能力，就企圖去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吧。實際的經驗會很快地教訓他們。

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分子，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而且必須要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政黨；現在我們就應當竭盡全力，使我們與「左派」的分裂、不至妨礙或很少妨礙將來這種匯合。俄國布爾塞維克特別幸福，就是他們還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群眾直接鬥爭以前，有了十五年的工夫，來進行有系統的、貫徹到底的鬥爭，既去反對孟塞維克（即反對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又去反對「左派」。而在歐洲和美國，同時這種工作，現時不得不用「急行軍」的辦法來進行。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企圖充當領袖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之內固執成見，知過不改。如果他們不以無產階級紀律自繩，不會「光明正大自處」的話，但工人群眾，一旦時機成熟，便會迅速地、容易的自己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有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能力的黨。

※

關於將來「左派」共產黨人，反國會派與一般共產黨人聯合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人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樁長處，就是他們在群眾中比較一般共產黨人善於鼓動。我在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上，也屢次看到過這一類的事情。不過範圍較小並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裡，而不是在全國的範圍內。例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塞維克，有的時候，在有些地方，鼓動群眾，比我們更加有效。其中一部分緣故，是因爲在革命時機或者關於革命的回憶歷歷在目時，採用簡單「否認一切」的策略，更容易接近群眾。然而這不能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一個共產黨，要想在事實上做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先頭部隊，而且要想學會領導廣大群眾，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群眾，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群眾、勞動者和被壓迫者底群眾，那末，它必須善於採用無論對於城市的、工廠的「街道」或對於鄉村都是最淺近、最通俗、最明瞭、最清楚、最生動的說話與方法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的工作。

二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裡，曾發表過意見，說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我曾經說過，要實現這種妥協，却是不容易的。接着我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都證實了。德國共產黨機關報『紅旗』第三十二期上（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Die Rote Fahne』，Zentralorga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urenschubd※），載德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卡普和留特維茨軍事『盲動』（軍事陰謀、軍事冒險）及『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的前提上，或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聲明都完全是正確的。基本的前提就是，目前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擁護獨立黨人。結論是：聲明對於『無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政黨而組成的社會主義政府』，採取『善意的反政府派』底態度（就是不准備用『強力來推翻』政府）。

※ 斯巴達團

這個策略，無疑地，基本上是正確的。可是，我們固然不應當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却不能緘默過去，例如社會主義叛徒們底政府，決不能（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上）稱爲「社會主義」政府，謝德曼這一流人以及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先生們的政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撇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政黨」這一種話，此外決不能像「聲明」底第四條一樣，寫出以下的話：

「……一旦政治自由，可以加以無限制地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不能成爲資本底專政，這種情形，由無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看來，由共產主義繼續奪取無階級群眾這一點上說來，是極重要的……」

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亨得遜派（謝德曼派）斯諾烏登派（克里斯平派）不會跳出，也不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却不能不是資本底專政。從獲得實際效果的觀點上看來（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設法尋求實際的效果，這是完全正確的），完全用不着寫這些原則上不正確和政治上有害處的東西。爲獲得實際效果起見，只須說（如果你要做一個國會議員的誘客氣的人）：城市多數工人，既然擁護獨立黨人，那末，我們共產黨人，便不能不讓這些工人，去嘗試「他們的」政府底經驗，以便消滅他們最後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也就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幻想。這種說法已足以做妥協的根據，這種妥協是真正必要的，而妥協

底內容應當是：我們在一定的時期以內並不企圖用強力去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至於在日當的群眾的鼓動中，並不受官場的國會的空套所拘束，自然可以往下發揮，說：「讓謝德曼這班下流東西，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庸人俗子在事實上揭穿自己，揭穿他們自己多麼受人欺騙，他們多麼欺騙工人；他們的『清潔』政府，將『最清潔不過地』做一番『清洗』工作，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叛賣階級的社會主義所有的污垢，『清洗』得乾乾淨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目前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們已經喪失了各種影響，那是不對的，在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為共產主義者而且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危險得多）底本來面目，在德國的考爾尼洛夫式的事變時，就是在卡普和留特維茨底政變時※，又暴露了一次，一個簡短而明瞭的證據，便是卡爾·考茨基所做的小小一篇文章，題目叫做

※ 這次政變，也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奧國共產黨出色的機關報『紅旗』

上，異常明瞭、簡單、切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列過（『Die rote Einheitswachtung』

1920 Nr. 1—266u.267 L.O.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7）（見一九二〇年維也納『紅旗報』第二百六十六和二百六十七期，署名L.O.L.

的作者所做的一篇文章，題名為『德國革命底新階段』）。

「決勝負的鬪頭」(LeFochard duos s'écroul) (註二〇)。這篇文章寫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Frohdelt」(「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上面，同時又有阿爾托·克里斯平底文章「論政局」(註三一)。(見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自由報」)。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會像革命家那樣去思索和論斷。這是多愁善泣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果他們宣稱自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末，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更要增加千百倍，因為在事實上，在每個困難和危險的關頭，必須要做出版賣的行動……同時他們却有一種「極誠懇的」信念，自以為幫助無產階級！你們難道還沒有看見冒充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由於他們胆小如鼠，毫無氣節的緣故，誤認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底情形沒有希望，就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刺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這個時候，他們也是要「幫助」無產階級呵！

三、意大利的徒拉梯及其同道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我曾經在這本小冊子內指出：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一類黨員，甚至這一班議員在自己的隊伍內，乃是一種錯

誤。旁觀的一個證人，更證實了這點，這個人就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The Manchester Guardian」的通訊員，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徒拉梯對他的談話（註三二）：

這個通訊員寫道：「……徒拉梯君認為革命的危險，並不大，並不至於在意大利引起無謂的顧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只是爲的要使群眾底情緒經常處在興奮與緊張狀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純粹是海外奇談，是不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毫不中用。這種理論的用處，只是使勞動階級殷殷期待，不致絕望。用這種學說來做香餌去眩惑無產者的人們，不得不進行日常的鬥爭，去獲得一些往往是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以便遷延時日。好教工人階級不至即時失掉自己底幻想，不至即時失掉對於自己的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在一個長時期內發生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鐵路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國內的情況，難上加難。因亞得利亞海問題而發生的困難，使國民不安，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國內情緒不振，但是我們的國家却還

不覺得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須知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秩序，重定民生……」

很明顯的，徒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幫手、軍師等所蒙蔽和粉飾的實際情形，却被英國的記者說了出來。這種實際情形就是徒拉梯、特列威斯、莫迪梁尼、杜郭尼這班先生們底

理想及政治工作，和英國記者所描寫的，真正一樣，恰恰一樣。這是澈頭澈尾的叛賣社會主義的行為。他們主張那些在僱傭勞動的奴役下替資本家生利潤的工人，遵守秩序與紀律，僅僅就這一點講來，他們的主張已經是多麼可惡呵！我們俄國人，何等耳熟地聽慣這種孟塞維克的說話！他們承認，群眾擁護蘇維埃政權，這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他們對於自然發展起來的罷工運動底革命作用，却絲毫不懂，這是何等鈍拙，何等與資產階級一樣的庸俗！真的，真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底記者替徒拉梯這一班先生們效了一番蠢勞，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保爾迪加同志及其在「蘇維埃報」上的夫人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要事實上擁護第三國際，那就要聲罪致討，把徒拉梯這班先生們趕出自己隊伍，那就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共產黨。

四 由正確的前提做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保爾迪加同志和他「左」的友人，却從正確的對於徒拉梯這班先生們所下的批評中，做出錯誤的結論，以爲只要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拿出絲毫鄭重的論據，以便自圓其說。他們簡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記」國際間利用資產階級國會的模範例子，而這種利用是真正革命

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對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毫無疑義是有益處的。他們簡直不懂得「新的」利用國會主義的方法，而只是高聲大嚷，口口聲聲，講到「舊的」、非布爾塞維克的、利用國會主義的方法。

這正是他們根本錯誤所在。共產主義不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在社會活動各方面都應該加入（如果不進行長期的、沉着的、百折不回的工作，它就不會加入）原則上新穎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底傳統沒有關係的東西（同時要保留和發展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編輯的工作來說吧。報章、雜誌、傳單，都執行必要的宣傳、鼓動、組織底工作。在一個稍微文明的國家內，群眾運動不能沒有編輯的機關。儘管你寶罵「領袖」，儘管你發誓要使群眾不受領袖影響而保全純潔，但終不能使我們不利用那些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物來進行這個工作，終不能使我們脫離資本主義下進行這個工作時所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一私有制度的「空氣和環境」。甚至在俄國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有了兩年半，但我們在自己的周圍還看見群眾的（農民的、手工業者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所形成的這種空氣，這種環境。

國會主義是工作的一種形式，編輯是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工作的人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群眾政黨底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底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者，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是，在這一方面也罷，在那一方面也罷，在資本主義下，以及在資本主義過

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時期內，無論在工作底那一方面，都不應當躲避那些困難，那些特殊的任務，這些困難和任務，無產階級應當加以克服和解決，以便利用那些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知識分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以便戰勝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見和影響，以便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的阻力，以後還要完全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環境。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以前，在一切國家內，我們難道沒有看到非常多的下面一種例子麼？當時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及其他等等，痛罵國會主義，嘲笑被資產階級所腐化的社會黨的議員，抨擊鑽營祿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借着編輯工作，借着工會工作，去做同樣的資產階級的鑽營祿位的勾當。如果只就法國來說，如沃和美爾格莫夫這些先生們底例子，難道還不是標本式的例子麼？

「拒絕」參加國會之所以幼稚，就因為他們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想·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鬥爭這一種困難任務，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閉起眼睛不·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被無恥的鑽營祿位，資產階級式的使用議席肥缺，改良派而解國會工作到了驚人的地步，卑鄙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陋習，凡此種種毫無疑義地，都是資本主義到處所產生的通常的而且是最流行的特徵，這些特徵不僅產生於工人運動以外，而且還產生於工人運動以內。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形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在推翻了資產

階級以後，也消滅得很慢，因為農民不斷地重新產出資產階級，在工作和生活底各方面，都產生形式上稍有差別，而實際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祿位，民族沙文主義，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卑劣行爲等等。

親愛的抵制國會派和反國會主義的人們呵，你們自己覺着「異常革命」，但事實上，你們却被那反對由工人運動內部發生出來的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中比較不大的困難所嚇倒，殊不知你們底勝利（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將產生同樣的困難，而且困難程度要大得多，不知要大多少倍。你們同小孩子一樣，被目前的小困難所嚇倒了，你們不曉得到了明天和後天你們不得不學習，不得不補習，以便打破同是那一種，而程度却不知大多少倍的困難。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會有更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鑽入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裡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庭，鑽進行政管理機關，因為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和無從建設共產主義，因為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戰勝、改造、重新培養、重新教育他們，——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本身一樣，無產者解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並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並不是用什麼神通法術、聖母意旨，也不是用口說、決議、法令所辦得到的，只有靠長期艱苦的群眾鬥爭去反對很普遍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才能辦到。現在反國會主義派這樣趾高氣揚、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

無知、一舉手就拋開這些任務，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也就是這些任務，要在蘇維埃底內部、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一法律辯護員中間重新產生出來（我們在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打破這種制度是正確的，但是這種制度在「蘇維埃」一法律辯護員一底名義之下又重新產生出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的教員中間，在蘇維埃工廠中享受特權的、就是熟練程度最高、條件最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國會主義所固有的一切壞處不斷復生，我們用無產階級的有組織和有紀律的精神，作再接再厲的、長期的、百折不回的鬥爭，我們只有用這種鬥爭，才日益戰勝——逐漸戰勝這種禍害。

自然，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面，在我們自己的黨內，即在工人的黨內，要戰勝資產階級的陋習，這是很「困難的」；要把那被資產階級的成見所完全腐化了的、習以為常的、做國會議員的領袖趕出黨去，這是「困難的」；要使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中間絕對必要的一部分人（即令人數很少）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這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裡建立真正配得上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黨團，這是「困難的」；要使共產黨議員不從事資產階級國會的玩意兒，而從事於群眾中的宣傳、鼓動、組織底迫切工作，這是「困難的」。凡此種種都是「困難的」，這是用不着說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強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勢力等等，也強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如果與無產階級準備得到勝利的時候，在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所不得不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易如兒戲。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我們要改造千百萬農民、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使他們統統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要戰勝他們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這些真正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麼，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裡，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黨黨團，乃是一樁易如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的」以及反國會主義的同志們，連現在克服這種小困難的事情，都不能學會，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去克服和改造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或者將來必須倉卒補習，但因為倉卒的緣故，他們一定要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害處，做出比平常更多的錯誤，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資產階級的環境，私有制度底習慣，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傳統，就一定由工人運動底內部和外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在活動底一方面，不僅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必然在社會活動底各方面，在一切文化和政治的舞台上，毫無例外。在某種工作上，遇着一樁「不痛快的」任務或困難，便想畏難偷安，抽身迴避，這是絕大的錯誤，由於這種錯誤，後來一定要償付代價。應該學習並學會怎樣去

駕御工作和活動底各方面（毫無遺漏），怎樣去到處克服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風尚、傳統和習慣。別種處置問題的辦法簡直是不鄭重的，簡直是兒戲。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五

在這本書底俄文版上，關於整個荷蘭共產黨在國際革命政策方面的行動，我有一點兒說得不正確。因此我利用這個機會，來公佈我們的荷蘭同志下列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信，並改正我在俄文版上所用的一荷蘭論壇派——這個名詞，用「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這句話去代替它※。

列 寧

※ 我們已在原文上加以更正了。

編輯部註

瓦英庫普底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三十日寫於莫斯科——

親愛的列寧同志：

我們，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荷蘭代表，由於你的關照，能夠在你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譯成西歐文字而未公佈之前，讀到你這一本著作。在你這本書裏，你好幾次特別提到你不贊同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在國際政治上所起的那種作用。

我們應當提出抗議，反對你把這幾個人行為底責任，加在共產黨身上。這是極端不確切的。而且，這是不公允的，因為荷蘭共產黨中這些黨員很少參加，或者完全不參加我們黨底日常工作；他們也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在共產黨內部實行反對派的口號；荷蘭共產黨及其所有的機關曾經進行並且直到現在都不斷進行極努力的鬥爭，去反對這些口號。致

兄弟的敬禮！

瓦英庫普代表荷蘭共產黨代表團謹啓

附

註

(1) 『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這本小冊子，是奧托·鮑威爾著的。

(二) 費邊派，這就是所謂費邊社的社員，該社以羅馬的名將費邊·匡克塔托爾(匡克塔托爾是拉丁話，意義就是做事遲慢的人)底名字命名，於一八八四年在英國成立，該社成立的用意，就是要用和平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合會相抗衡。該社正式宣佈的宗旨，就是要用民主的精神來修改英國的憲法並宣傳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去組織生產。該社不放棄政治鬥爭，不拒絕參加國會選舉。同時它却否認階級鬥爭，宣傳階級合作，不承認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三) 列寧所指，是普列哈諾夫著的『白色恐怖』一文，該論文登載於一九〇三年第四十八期『火星報』上。普列哈諾夫在這篇論文中關於法國大革命底恐怖寫道：『比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抬出歷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雨風暴一樣」光臨法國，它無情地破壞了「舊制度」底一切殘餘。然而這種恐怖是什麼呢？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它的巨大力量是由什麼地方得來的呢？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究竟是什麼呢？據馬魯頓正確的意見，恐怖開始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打破巴士底里獄的時候，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底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上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群眾底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對群眾運動底力量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由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

「……恐怖底代表，乃是法國人民反對歐洲反革命聯合力量而進行的英勇決鬥中的領導者。這種恐怖的歷史，對於俄國的革命者，是異常值得學習的。然而它之所以值得學習，正因為它不斷向我們說：必須準備我們俄國的民衆去打破我們全俄各處的巴士底里獄。」（見『普列哈諾夫文集』第十二卷第四四九至四五〇頁）

（四）列寧所指的是普列哈諾夫著的、登載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第二——三期『早霞』雜誌上的『Cant 反對康德，或者是伯恩斯坦先生底精神遺囑』（Cant 的發音與康德同，字義却是口是心非。

譯者註）。這篇論文上的下列一段話：『伯恩斯坦先生底見解中現在只剩下社會主義底很少的痕跡。實際上他接近於主張『社會改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比接近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要多得多。然而他依然做一個『同志』，人們並沒有把他清洗出黨。』（見『普列哈諾夫文集』第十一卷第六十三頁）

（五）『斯巴達』團，是秘密的組織，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以季卜克內西等爲首的德國左派建立這個組織，其目的在於進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鼓動，該團體會開展真正革命的反抗鼓動，然而它却不能解脫中派底影響，它看不見與各種機會主義者有分裂之必要，它依然留在社會民主黨底範圍以內。一九一六年『獨立黨人』（加阿捷，列迭布爾）與社會沙文主義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分裂以後，『斯巴達』團曾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同時却保留自己的組織，依然爲一個特別的團體。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以及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派和獨立黨人組織了政府以後，『斯巴

達「團與獨立黨人斷絕關係，到了那年十二月該團宣佈取消，而組織德國共產黨。

(六) 工黨黨人乃是英國工黨底黨員，該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它在自己的隊伍中包括工聯底會員以及其他工人組織底會員，它的目的，主要的是國會鬥爭和進行選舉運動。在第二國際中工黨是極右派。

(七) 馬依諾河畔弗朗克福爾特地方出版的「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之分裂」(Die Spaltung der K.P.D. (Sp. rtakusbund) Frankfurt a. M.) 這本小冊子，是「左派」共產黨人底團體所出版的，其中所論述的要點，後來就成爲德國共產黨政綱底基礎。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底舉義很厲害地被鎮壓下去，這就使得一部分德國共產黨人主張審查黨底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不久以後，還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德國共產黨底裂痕就已表現出來了。新派底人(什列迭爾、威格、威德列爾)，認爲無產階級失敗底主要原因，第一就是工人階級分散在好些政黨之內；第二，就是過於重視公開的鬥爭方法，他們以爲實際上這種方法使群眾底革命自動精神降低。「左派」共產黨人，反對黨底策略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主張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Allgemeine Arbeiterunion)，來統一所有主張直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的革命工人；「左派」共產黨人堅持「直接行動」，要求共產黨人拒絕參加反動工會中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在甘迭里別爾格的黨代表大會上，「左派」舉手反對德共中央底「甘迭里別爾格的提綱」，他們被剝奪了繼續參加黨代表大會工作的權利，並被開除出

黨。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反對派底柏林代表大會上（該大會代表了幾千個反對派分子），『左派』組織了新黨，叫做德國共產黨，開始與德國統一的共產黨進行持久的鬥爭，使革命無產階級底隊伍大形渙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致德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期『共產國際』雜誌）上指出德國共產黨底綱領式的宣言、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原則，『顯然離開共產主義』……『而走到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政策方面去』。德國共產黨與群眾的工人運動沒有聯系，它的綱領上和策略上的原則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觀點底混淆，所以不明確和不固定，因為這個緣故，就在共產黨裏，有了產生新的、顯然表示『民族主義的』右傾反對派之餘地。在該黨內部，形成了而且發育了右的派別，即所謂『漢堡派』（Hamburger Richtungs）。

（八）本書與俄文版同時出版的，有英、德、法文版。列寧在他專門寫給英文版的增補中，指出必須把他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壇派』這一個名詞，改爲『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我們在原文上已經遵照列寧的指示加以改正了。

『論壇派』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國際以後，就建立了荷蘭共產黨，後來由荷蘭共產黨中產生了『左派共產黨員』。不久之後，『左派』底領袖——洛朗德·郭里斯特與郭爾鐵爾離開了政治活動。

（九）『Kommunistische Arbeiter Zeitung』（共產主義工人報），乃是德國共產黨底

機關報。該報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出版至一九二七年停版，開始時是日刊，後改爲每星期出版兩次。該報擁護『直接行動』底方法，激烈反對利用公開的鬥爭，例如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會及加入工會。

(一〇) 最後這一段話，由列寧建議，會完全採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提綱，該提綱是肯能和庫西寧起草的。

(一一) 根據聯共(布)歷來代表大會底統計，由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起至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止，黨員人數底變更如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底全俄四月會議，計八萬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計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底第八次代表大會，計三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計六十一萬一千人。

(一二) 列寧所指的是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在這封信裏，恩格斯寫道：『工人們在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之後，由於暫時的經濟繁榮，由於他們期待『帝國底榮譽』，似乎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請看『馬恩書札』一書。該書是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的。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七〇頁)。

(111) *Folkets Dagblad Politiskt* (『人民政治日刊』)，是瑞典共產黨底日報。一九一六年爲赫格龍特所創辦。一九二〇年該報主張必須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實行了努力的鼓

動，以反對參加瑞典政府的正式社會主義者（以布朗停格爲首）所實行的讓步政策。

(一四) 世界產業工人會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是美國工人底革命組織。一九〇四年，當西部礦工聯合會底鬥爭正激烈的時候，產生了這個組織，以便與妥協的美國勞動聯合會對立起來。這個組織到了一九〇五年才在組織上完全形成，它具有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世界產業工人會底主要活動，就是多半在無產階級最落後和無組織的階層中組織罷工。在罷工的時候，這個組織用革命鬥爭底方法來行動，與警察衝突的時候，就組織工人來自衛。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世界產業工人會底會員實行了幾十次大罷工而得到大勝利。在大戰的時候，世界產業工人會並沒有中止群眾的罷工鬥爭，因此它的會員備受政府壓迫。十月革命以後，在美國成立共產黨以後，世界產業工人會敵視美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只是在共產國際執委向世界產業工人會發表宣言以後，這個組織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態度才改變了性質，而且在一九二〇年甚至進行了談判，討論世界產業工人會執行委員會底代表與統一共產黨底代表是否可以召集共同會議的問題。

(一五) 此地所指的，是荷蘭「左派」共產黨人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該提綱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一期「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上 ([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 1, February 1920)。

(一六) 列寧此地所指的是迪茨根所著的「哲學底成績和關於邏輯的信」 ([Das Axiom der

Philosophie und Briefe über Logik) 書中上列一段話：『同時只須慎重其事，不要誇大區別，不要使這種區別過度，以便不至於荒謬。』

(17) 『Il Soviet』，即『蘇維埃日報』，一九一八年左派社會主義者——擁護第三國際的人，在聶阿坡里地方創辦該報。主筆是波爾迪加。列寧所指的是下列三篇論文：(1) 『意大利社會黨中共產主義的懷疑派』 (『Frizione Comunista Astensionistado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見於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八日第三期『蘇維埃日報』上)；(2) 『列寧與懷疑派』 (『Lectin el, astensionismo』，見於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上)；(3) 『錯誤』 (『Il Fallot』，見於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上)。

(18) 『Comunismo』 (『共產主義』雜誌)。每兩星期出版一次，由謝拉梯主編。一九一九年創辦。列寧此地所指的，是下列兩篇論文：(1) 『社會黨在波洛尼亞所召集的大會』 (『Incongresso Socialista di Bolonia』，見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的第一期『共產主義雜誌』上)；(2) 『徒拉梯與最高限度派』 (『Filippo Turati e il massimalismo』，見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期『共產主義雜誌』上)。

(19) 『Der Volkswacht』 (『民權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舊時中央機關報，在萊布齊地方出版，由威廉·李卜克內西主編。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參加了這個報

紙的工作。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間，恩格斯在『民國報』上做了許多論文，後來把這些論文搜集起來，出了一本小冊子。一九〇六年求知社把這本小冊子譯成俄文出版，名爲『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的文集』（斯米爾諾夫翻譯，薩文校訂）一九一九年由北方書社出版。列寧所引證的是最近出版的本子。

(二〇) 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維什聶威茨加婭的信中寫道：『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革命進程底解釋，這種進程是引起許多彼此追隨、絡繹不斷的現象的。』（請看『馬恩書札』一書。這本書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三五七頁）。

(二一) 列寧顯然只憑自己的記憶來引證這一段文字。車爾內舍夫斯基對於克里所著的『致北美合衆國總統的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的信』一書之俄文譯本，做了評論他在評論上說：『歷史的道路，並不是聶瓦大街，這整條道路，有時經過塵土飛揚的田野，有時經過濘泥卑濕的田野，有時經過涯地，有時經過叢密的森林。誰要害怕塵土飛揚，害怕弄髒鞋子，誰就不要從事社會的活動。』（請看『車爾內舍夫斯基全集』，一九一八年版，第八卷，第三七至三八頁）

(二二) 此地所講的，是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火星報』編輯部在苗漢地方與司徒魯威所代表的『民主反對派』底談判。談判內容，就是磋商司徒魯威及其團體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條件。

談判結果，根據司徒魯威所提出並為火星派大多數違反列寧的意見所通過的條件而擬好協定，但在實際上，這種協定，却沒有實行（詳細情形，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六十八至六十九頁，以及第五百六十七頁上的第三十六個註解）。

（二三）革命共產主義者，乃是米爾巴黑（米爾巴黑是德國的外交家。一九一八年締結布列斯特條約以後，曾被任為駐蘇俄大使。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企圖破壞與德國所締結的和約，在莫斯科作亂，殺死了米爾巴黑——譯者註）被殺以及『社會革命黨』左派暴動（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後，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分子。一九一八年七月末，在薩拉托瓦地方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組織和團體舉行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召集代表大會並組織新的民粹黨。根據會議底決定，在莫斯科出版『勞動意志報』，這個報紙開始時是由亞歷山大洛夫、巴捷里、比層科、多布洛霍托夫、科列加葉夫、烏斯亭諾夫主編（後來這個報紙改為雜誌）。

九月二十五日在勞動意志派底代表大會上奠定左民粹黨底基礎，該黨自稱為革命共產主義黨。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上特別指出該黨底策略立場如下：『新政黨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政綱說來，依然是民粹黨，同時它採取切實的和誠意的與布爾塞維克合作的策略，採取真正蘇維埃政黨底立場』。『……它放棄秘密的活動，也不去破壞共產黨員底內外政策，它承認共產黨員是革命主要的領導力量。』『……黨承認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底階級勝利必要的條件，承認蘇維埃政權創造客觀的先決條件去建立社會

主義的制度。」……黨認爲只有蘇維埃政權是第三國際理想和社會主義底唯一的真正代表，所以它在國際政策底問題上，認爲只有不削弱和不破壞蘇維埃政權而是鞏固這種政權的種種辦法，才是適當的。」

當時納唐松在他致『勞動意志報』編輯部的信中，也完全同意於代表大會底決議（見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勞動意志報』第十四期上）。

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該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該黨底政綱。這個政綱雖然企圖放棄『社會革命黨』的傳統見解（例如這個政綱提出必須實行農業集體化），然而它依然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它是民粹派折衷主義底表現。但同時這個政綱特別明顯指出這個政黨底策略基礎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政黨底策略基礎。

革命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大的團體，它主要的是想依靠農民，但是它在農民中間沒有什麼大影響。該黨底上層領導分子力圖與布爾塞維克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在地方的組織中又有富農分子企圖利用該黨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因此在黨內形成不斷的危機。從一九一九年春季起，該黨發生分裂，分出若干團體，其中有一部分轉入俄國共產黨（布），其他一部分投到『社會革命黨』左派方面去。

一九二〇年四月，該黨由於對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組織勞動軍以及勞動軍事化——突應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召集該黨底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該黨底右傾分子佔多數，他們企圖

使黨走上積極反對布爾塞維克的道路。然而該黨在中央委員會底逼迫之下（中央委員會甚至不惜把大會解散了），依然能夠保持原有的策略立場。自從那個時候起革命共產主義者開始準備轉入俄國共產黨（布）。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許可革命共產主義者派兩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通過關於一個國家內只能有一個共產黨的決議之後，革命共產黨就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月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加入俄國共產黨（布）的決議。

（一四）還在大不列顛共產黨未成立好久以前，就產生一左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儼然成爲一派。這個運動底基本特點，就是劇烈反對國會活動和反對英國工黨。左派中最大的組織——社會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在這個問題上曾採取最不調和的態度。這個政黨底基本核心，就是——九〇三年脫離社會民主黨聯盟（該聯盟在甘特曼底領導之下，降到右的社會愛國主義組織底水平）左的份子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加入社會工黨的革命工人（因爲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社會工黨底革命的、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宣傳曾在英國工人羣衆中起了極大的影響）。社會工黨參加了關於統一問題的談判，要把凡是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立場的左派組織合併起來成爲統一的共產黨，然而它却提出不加入工黨，作爲統一的不易條件，但是沒有得到不列顛社會黨方面的贊助，因此拒絕繼續談判，同時該黨的要人坡烏里、馬克·曼努斯和別里在這個問題上表示讓步，並繼續參加統一會議，因此被開除出黨。附和左派的第二個組織，——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South Wales Soci-

alist Society)，——乃是威爾斯地方積極的煤礦工人比較不大的一個團體，它帶了工團主義的性質。這個團體極端不主張革命的政黨參加國會，這就使得它與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接近起來，而這個聯合會裏面，多半是婦女，她們在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脫底領導之下採取了極左的反國會的立場，這種立場在實質上只是該聯合會一般不主張政治活動的局部表現。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後來改名為共產黨）宣佈自己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依然堅持自己政綱上和策略上的觀點，在共產國際裏保持「左的」反對派地位。在蘇格蘭工人中間，影響比較大的，是工廠工人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這些委員會是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組織起來的，它們組織起來的目的，就是要反對那些宣傳階級和平並放棄罷工鬥爭的妥協派的工聯。工廠工人委員會不僅領導了這一時期的罷工鬥爭，而且也進行了公開的反戰宣傳。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在武裝干涉和封鎖的時期，工廠工人委員會會努力進行了鼓動工作，來擁護蘇俄，要求英國政府承認蘇維埃政權並與它恢復商業關係。在對內問題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堅持必須進行群眾的革命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便建立依靠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廠工人委員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它們同時進行了激烈鬥爭去反對工黨在國會內和國會外的活動。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底代表會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工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八月六日最後一次會議上，列寧在自己的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講演中，曾批評工

廠工人委員會反對加入工黨的態度。大不列顛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至三日），把參加國會選舉和加入工黨這兩項列入自己的政綱，而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左的團體，却依然沒有加入共產黨。它們依然獨立存在，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里德斯地方舉行共產主義組織和團體代表大會的時候為止。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大不列顛共產黨、共產黨（以前的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蘇格蘭共產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格拉茲地方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以及其他幾個共產主義團體合併起來，成爲大不列顛統一的共產黨，它們完全站上共產國際的立場。社會工黨這一次也不同意合併，在該黨的上層分子中間，對於加入工黨的問題，保持激烈反對的態度。該黨地方組織中有很多黨員會主張與共產黨員合併。

(115) [Workers Dreadnought] ([工人無畏艦])，乃是一九一四年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 (W.S.F.) 在倫敦所創辦的機關雜誌。主筆是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該雜誌進行了反國會的鼓動並聲言反對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加入英國工黨。

(116) 加拉克爾所著的論文底完全題名，是 [A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W. Gullacher in the name of the Scottish Workers Committee of Glasgow] ([Workers Dreadnought] No. 8. 21 February 1920) 加拉克爾用格拉茲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致主筆的一封信（見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工人無畏艦] 雜誌第四十八期上）。

(二七) 『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國最有勢力的地方報紙之一，在曼徹斯特地方出版，反映自由黨左派底利益。一八二一年創辦。現時主筆是斯科特。

列寧在此地所講到的魯易·喬治底演說，是魯易·喬治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在下議院底自由黨黨底會議上作的，並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二九六五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發表，標題爲：『Mr. Lloyd George's speech to the Liberal Mps.』(『魯易·喬治對國會底自由黨黨團所作的演說』)。

(二八)引自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的論文『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走向共產黨去』)，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工人無畏艦』雜誌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上。

(二九)懷疑派乃是意大利社會黨底左派小組織，它在保爾迪加底領導之下，努力與改良派作鬥爭，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後來到一九二一年，在里沃爾地方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上，懷疑派由社會黨中分裂出來，成爲組織意大利共產黨的基本核心。

(三〇)考茨基所著的論文『Entschieden Standau』(『決勝負的關頭』)，講到魯爾區域中鎮壓工人武裝起義的事情。考茨基寫道：『魯爾區域中目前的波動，只是卡普和留特維底國家政變所引起來的反動。如果沒有這一次政變，魯爾區底工人就不致於實行武裝起義，那裏直到現在都會極其平靜。政府避開參加政變的人而逃到什徒特加爾特去，以避免流血慘劇，政府並不以此事丟醜。』

政府自從得到勝利以後直到現在，也沒有懲罰參加政變的任何人。政府是否能夠用自己的仁慈態度（雖然稍微有一點仁慈態度也好）去對待更加勤勉的工人（整個德國底生命有賴於這些工人們底手所做的工作）呢？如果政府在這一方面不採取任何辦法，那時德國人民就要受苦，那時德國人民就要過黑暗的日子了（見『Freiheit』報第九十七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三二） 克里斯平底論文『Zur Politischen Situation』（論政局）登載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第一二二期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底『自由報』上（『Freiheit』）。

（三三） 列寧此地所引證的，是 E. C. 著的論文『An Interview with Turan』（E. C. 著『與徒拉梯的談話』），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第二二九五九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The Manchester Guardian』）。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九四七年七月 東安 10000

定價

元